

複合式語言及難解的棋局：

晚清時際的「群」／「群學」和「社會」／「社會學」

韓承樺*

摘要

本文討論流行於晚清時際的兩組詞彙、概念：「群」／「群學」和「社會」／「社會學」。「群」與「群學」這組詞彙、概念，原是為回應晚清政治問題而形成，後又成為時人翻譯、引介來自西方，轉道日本的“society”、“sociology”，從而與「社會」／「社會學」交織為一複雜的語言、概念、思想論述的網絡。本文認為，當我們要脈絡化地思考新名詞、概念於晚清時論、思想界的問題時，或許得將之想像成一種複合體。晚清語境中的新語詞或概念，其意義內涵於各類論述裡的展演，皆是在與其它可能是舊的、意義相近，甚至相反的詞彙、概念交織互動中體現。這樣的「複合式語言」，提供知識分子一套足以描寫世界，及試圖想像扭轉、重整世界的思想工具。「複合式語言」之形成和運作，更反映了晚清政治、思想文化脈絡中，幾個相互關聯的議題：進化論、歷史書寫、群體組成與內部秩序規劃。此一問題群組就如同同一盤棋局，「群」／「群學」、「社會」／「社會學」就為棋盤中的兩方對手；時論者選用不同的詞彙，在語言、概念上或有區隔，亦有匯通，展示了相異的觀察社會、政治變遷之角度，卻又是立基於高度思想關聯性的問題邏輯上。而棋局中的問題群組，就適度具現了傳統中國於現代轉型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關鍵詞：群學、社會、社會學、新名詞、複合式語言

* 作者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The Complex Chess Game of Compound Languages:

Qun/Qunxue and Shehui/Shehuixue in Late Qing China

Cheng-hua Ha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wo sets of concepts — *qun* 群 / *qunxue* 群學 and *shehui* 社會 / *shehuixue* 社會學 — agains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late Qing China, showing how their interweaving produced an intricate network of languages, concepts, and discourses. Additionally, the formation of a compound language by these four terms demonstrates how the practices of new concepts in the late Qing were actualized through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traditional, the parallel, as well as those diametrically opposed terms.

Initially, *qun* and *qunxue* emerged as concepts responding to a specific political context in nineteenth century Qing China. Subsequently, both terms were also employed to translate the new Western concepts of “society” and “sociology” respectively. At roughly the same time, however, two other neologisms—*shehui* and *shehuixue*—made their way from Japan into China, thus directly competing with the indigenous set of terms. Resembling at times an intricate chess games with multiple tactical constellations, the relationship

* Ph. D.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etween *qun/qunxue* and *shehui/shehuixue* shows how concepts were appropriated by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to not only describe their world, but also transform it. This resulted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a compound language related directly to the emerging discourse of 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changing understandings of historiography and visions of a new society.

Pursuing specific goals and agendas, intellectuals would strategically choose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newly invented terms, thereby demonstrating different, at times mutually opposed attitudes concerning Qing China's society and po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se competing attitudes remained embedded in two closely related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thus further reflecting the complex nature of the late Qing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qunxue*, *shehui*, *shehuixue*, neologisms, compound language

複合式語言及難解的棋局：

晚清時際的「群」／「群學」和「社會」／「社會學」

韓承樺*

一、前言

1902年的《新民叢報》上一則關於「社會」的討論，是研究晚清新名詞、概念者經常援引的材料。投書的讀者，因梁啟超（1873-1929）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一句「實為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備感困惑。¹該讀者表示，「中國當時候未有社會」，這般敘述單位如何作為描寫中國歷史情狀的詞彙呢？梁啟超澄清道：「社會」是日本人翻譯英文“society”的用詞，中國譯成「群」。他為了表述「人群」之意，就在報紙上常見到的「群」和「社會」，隨意選了後者來用，並沒有特別的涵意。²此見梁啟超實是「隨筆所之」，並非有特定考量。循這則材料，我們可以想像當時候語言環境的變化，因接受大量來自西方世界的新事物、知識和概念，且混雜從日本輸入的「和製漢語」，兩者合而擾動了固有的漢語世界，造成新式詞彙、概念和傳統詞語的相互競爭，困擾多數閱聽者。

¹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叢報》第4號，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1902年3月14日），頁60。本文引用《新民叢報》、《浙江潮》、《江蘇》、《時務報》、《杭州白話報》皆出自「民國時期期刊文獻資料庫」，網址：<http://www.cnbkys.com>，檢索日期：2017年4月10日。

² 梁啟超：〈問答〉，《新民叢報》第11號，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五日（1902年8月8日），頁87-88。

梁啟超與讀者的討論，實反映了晚清中國的幾個關於語言、詞彙和思想觀念的現象及問題。第一，新詞彙、概念輸入中土，是愈趨普遍的狀況。第二，詞彙的輸入，是在全球流通管道上展開。誠如漢語語境裡「society——社會」的對譯關係，就是一個新的西方概念，日本使用傳統漢字翻譯，再輸入中國。第三，眾聲喧嘩的新詞舊語，呈現一幅複雜的歷史畫面；而致此結果者，不一定皆有特殊意涵的考慮，偶然的因素居多。第四，時人就生活在這個新舊詞彙、概念層疊的環境中，其人選用新詞時，也許仍是表達舊意，亦有點拈新意的機會。這幾種情況是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正如該位讀者的提問，很可能是在知曉「社會」之新意的前提下產生；而《新民叢報》的回覆則顯示，其認為讀者還是從傳統「社會——立會」的角度在閱讀文章。

「他日亦必通行於中國無疑矣。」梁啟超當年對「社會」發展的預言，很快就成真了。現代學者利用資料庫做的統計，自1903年起，「社會」一詞的使用頻率便已超過「群」，漸成時人普遍的選擇。³ 誕生於20世紀初期的辭典，即為明證。1916年，德人赫美玲（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 1878-1925）編成較能代表官方譯詞立場的字典《官話》（*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書中，“society”的「部定譯詞」——也就是經過清政府學部所設立的「名詞審定館」，由嚴復（1854-1921）、王國維（1877-1927）等人釐定的翻譯語彙——為「社會」。⁴

與「社會」差不多時間點來到中國語境的，還有「社會學」。它和相

³ 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頁190-191。

⁴ 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6), 1352. 「英華字典」資料庫，網址：<http://mhdb.mh.sinica.edu.tw/dictionary/enter.php>，檢索日期：2015年12月14日。

關涉的「社會主義」、「社會黨」、「社會問題」，以及各類用以描述相異性質之「社會」，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語言、符號系統。在這張思想知識的語言平臺上，相對應的則是一種以傳統詞彙「群」、「群學」為核心的論述、言說工具。「群」／「群學」、「社會」／「社會學」，這四個詞彙於晚清時際編織成的語詞、概念光譜，就為本文要釐析的主題。這個主題，又涉及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發展的脈絡。換言之，本文不僅是在探究詞彙、概念的問題，亦是考究知識發展的歷史。

這個新名詞的問題牽涉兩個研究範疇：新詞彙、概念和思想形成，知識轉型和學科建立。兩者皆與中國、西方、日本的交流互動有關，亦不脫翻譯、傳播流通、詮釋與再生產的實踐過程。環繞著兩個相涉問題，逐漸勾勒出幾個方向的議題：「群」／「群學」與「社會」／「社會學」的差異？知識分子如何理解、詮釋西方社會學的概念和意義？究竟是從傳統思想角度的「群學」出發，還是單純援用西方學術的思維，抑或是兩者混用，難以釐清？「社會學」如何與「群學」在思想脈絡接軌，以及舊的詞彙、概念如何被新者取代，其背後的思想意義又是為何？總的來說，結合新、舊語彙脈絡的思考，即為探析新名詞、概念乃至於學科知識的形成。有論者考察社會學史，從晚清時論界諸多「群學」語彙中，揭櫫嚴復所提倡之「群學」，方為涵納西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社會學的起點。⁵ 部分論者考循幾位知識人的「群學」／「社會學」之內容及思想目標與意義，聚焦在社會進化論思潮、線性史觀和「新史學」，以及關於群體與國家形成這幾個問題。⁶ 這些研究顯示，「群學」與「社會學」的接軌與轉

⁵ 姚純安：《社會學在近代中國的進程（1895-1919）》（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頁18-35。

⁶ 王天根：《群學探索與嚴復對近代社會理念的建構》（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韓承樺：《審重咨學：嚴復翻譯《群學肄言》之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黃克武：〈何謂天演？嚴復「天演之學」的內涵與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5期（2014年9月），頁129-187；宋學勤：〈梁啟超與社會學〉，《史學月刊》2007年第12期（2007年12月），頁95-101；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79-101。

換所促成的，是一個觸及了人群分野、國家結構、歷史時間表述和編纂的新興知識論域。

多數的提問反映著研究者特別關注在這段歷史轉換時期中，「群」／「社會」替代的原因、過程及所蘊含的思想、文化議題。論者均試圖在描述語詞轉換的歷史過程基礎上，進一步做出具思想、社會文化意義的解釋。較具代表性者，如前文所舉之金觀濤、劉青峰仰賴語詞統計資料，將晚清社會變遷、革命情勢逐漸加劇，與「社會」取代「群」此一語言變化聯繫在一起。德國馮凱（Kai Vogelsang）的研究，也是從「社會」如何、為何取代「群」的角度來思考此問題。他認為「群」和「社會」在概念上是相對立，前者是偏向描述自然、原始狀態的完美群體，後者則是立基於差異與多樣性之上。語義上的差別，與清末社會變遷、革命熱潮的激化，導致人們在語詞使用的選擇，走向從「群」到「社會」的轉變。⁷於此，語詞和概念的轉換，遂被論者賦予一種著重「更替之因果」的脈絡化解釋。

本文即為反省過往這種脈絡化想法。前舉從新詞彙、概念和思想形成角度，以及知識轉型、學科建立的面向所提出的問題，均是針對「轉換」的脈絡來描寫「變」的層面。筆者認為，他們都忽略了歷史的轉換，多半不是全盤的代換，而是緩進逐步剔除部分元素，摻入部分新元素，再通過競爭從而確立某些要素的權威。換言之，「群學」與「社會學」在時人發表的各類文論間，很可能在敘述方式及概念內涵，乃至於言論指涉之思想目標產生一定程度的交織。欲追索這段歷史發展，研究者便不能採取此般界義分明的框架，來看待概念意涵尚未明確界定的階段。那可能會導致我們錯失部分概念尚在成形階段的細微變化。

事實上，大多數歷史轉換過程，應該是在一個「不透明」的情境下展開。從王汎森關於「歷史世界的不透明性」之論來想，現代研究者或多或

⁷ 馮凱（Kai Vogelsang）著，朱聯璧譯：〈中國「社會」：一個擾人概念的歷史〉，收於孫江、陳力衛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二輯）》（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頁99-137。

少都有某種程度的「後見之明」，從已知的環境改變來判斷人們對語詞運用的方式，認為言說者在選擇詞彙時，是有意識地呼應思想環境的變動。⁸ 由此而論，當時史料所示，字裡行間很難見出作者是「有意識地」在選擇詞彙。質言之，討論此時語彙的變化，並不能太過簡單地將其與當時的政治、思想環境變動直接聯繫在一起。反之，我們或許先得思考，當時語言使用者面對大量新、舊名詞、概念時，他們所做之選擇、行動，是在受到傳統語彙、思想、文化環境的限制下形成。倘若檢視晚清時論者說明「群學」和「社會學」的例子，往往會發現他們是交替使用此二詞彙，且在概念詮釋的部分亦有互釋的情況。換言之，同時觀察「群」／「群學」、「社會」／「社會學」這兩組詞彙，可能見到的歷史圖像，其中的對立性就又不是那麼顯著。

本文即為探究歷史轉換過程中的新名詞現象。我並非要去問「為什麼」會有此般變化，而是在深描細寫的基礎上，討論這般複雜變化編織而成歷史世界的樣貌與意義。筆者認為，「群」／「群學」、「社會」／「社會學」這兩組詞彙，是必須並置同觀的。借鑑於德國「概念史」的研究，在考察單一概念時必須採「語義場域」而非「單一詞彙」的角度，同時注意其與相反詞、平行詞、關聯詞相互關涉的情形。⁹ 並不是關注單一詞條，應是統一的詞彙群。據此，本文嘗試環繞著晚清語境中的這四個詞彙，提出另種解釋。這是奠基於一種思考歷史問題的反省。我們必須想像當時候的語詞使用者，是在無法完全知曉、區分新、舊詞彙概念意涵之間的差異，在一種語義、概念尚不確定，摸索一套新的語言論述系統情況下，才製造出此些可茲後人分析的新名詞材料。質言之，材料中的歷史行動者，是在「有限理性」的條件下，僅有不完整的訊息，也無法窮盡各種可能的選項，

⁸ 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臺北：允晨文化，2014年），頁53。

⁹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 and Social History," in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ed. Reinhart Koselleck, trans.,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88.

所作出的判斷。¹⁰ 這樣來看，清季時人對於新名詞的理解與思考，乃至於運使，實是在這種比較混沌的情況中產生的，無法形成一種清楚明確的判斷。「群」／「群學」、「社會」／「社會學」，起初是為回應晚清中國的政治問題出現，後又因時人為嘗試翻譯、引介西方概念、知識“society”、“sociology”而形成，兩者時常是交疊地出現在各類語境裡。言說者使用新詞彙時，往往是表達混雜了舊概念、思維的語義；反之亦然。誠如論者針對清人思維方式與概念內涵的討論，亦指出是有疊合或並置新舊、正反或相互矛盾的「複合性思維」現象。¹¹ 清末時際的語言和概念應復如是。本文嘗試描寫這四個詞彙、概念於清末各式語境中相互交涉，從而形成一種「複合式語言」。這套語言系統，提供知識分子描述且試圖扭轉世界的概念工具，其更進一步反映了晚清政治、思想文化脈絡中，幾個相互關聯的議題。

二、「社會」自東瀛來：近代日本的線索

現代語義的“society”，其實經過滿長一段時間的演變，約自 15 至 17 世紀之間，就有如“sosietie”、“sotietie”、“society”幾種形式。其涵義可區分成三個範疇：第一，表述連結、參與或合作關係，包含一般性活動及政治行為。第二，指涉生活條件或是和他人協同的狀態，也就是意指人們為求協和生活、經濟利益而可能採用的習俗或組織形式。第三，表達一個群體、社團或團體的意思。這部分比較複雜，可涵蓋處於國家或某區域底下的人群；共享習慣、法律、制度，具備相同目標、利益或專業；標識一特定、明確的區域，如學院或修道院；因宗教崇拜而結合……等。¹²

¹⁰ 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頁 47-48。

¹¹ 王汎森：〈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晚清以來的「複合性思維」〉，收於思想史編委會：《思想史 6——專號：五四新文化運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 年），頁 239-249。

¹²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 (online version), s.v. “Society,”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5, <http://www.oed.com/view/Entry/183776?redirectedFrom=society#eid>.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現在我們一般認為那種從「政治的社會」範疇內勾畫出屬於「市民的」部分（in the delineation of “civil” from “political” society），可用以表述此概念的“society”，約為從前工業時代（pre-industrial）轉型至工業社會（industrial society），和“sociology”此類知識同時出現。¹³ 此變化並非轉瞬即成，而是經過了 17、18 兩世紀之久；歷經「啟蒙時期」（Enlightenment）來自認識論、道德、宗教、政治各面向，為回應這些思想危機才緩漸形成。¹⁴ 17 世紀的歐洲思想，是以「契約論」式的想法，思考人類結成政治實體的原因，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二人，概皆持此說。至 18 世紀，圍繞著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1670-1733）撰作之《蜜蜂的預言》（*The Fable of the Bees*）所引發的爭議，促使其時思想家思考關於「契約論」以外的想法。他指出，人類社會的起源及運作基礎在於：人們是以滿足自身慾望而行動，進而促成他人利益，此即為「私惡公益」（private vices，public benefits）的論點。曼德維爾此說，被研究者認為是和過往「契約論」進行的一場思想對話，亦替後出如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的現代經濟學說，奠下初基。¹⁵ 至於曼德維爾反覆論及那由個人利益為中心，運作結成之「商業社會」，則成為「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討論中幾組互為背反之觀念——個人的／社會的、私人的／公眾的、利己／利他——於 18 世紀以降，逐漸萌芽的雛形。¹⁶ 於此，文獻材料中看到的“society”，才漸成為指涉一個有別於國家、政府的「實體」，是

¹³ Larry Ray, “Society,” in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IX, ed. George Ritzer and Ryan J. Michael (Malden: Blackwell, 2007), 4581-4582.

¹⁴ Keith Michael Baker,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stitution of Society: Notes for a Conceptual History,” in *Main Trends in Cultural History*, eds. William Melching and Wyger Velema (Amsterdam-Atlanta: Rodopi, 1994), 120.

¹⁵ Edward G. Hundert, *The Enlightenment’s Fable: Bernard Mandeville and the Discovery of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筆者對於曼德維爾的瞭解，是仰賴陳禹仲：〈近代早期歐洲思想史中的曼德維爾〉，收於思想史編委會：《思想史 4》（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 年），頁 275-312。

¹⁶ Adam B. Seligman,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Toronto: Maxwell Macmillan Canada;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92), 25.

於現代歐洲內逐漸興起的，一個屬於「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¹⁷ 綜言之，“society”和“sociology”，這個詞彙、概念與知識，均為西方世界逐漸步入現代性一途中的產物。

“Society”概念的複雜性，反映近代歐洲國家結構和政治思想變遷的痕跡。對譯“society”的「社會」的成形，亦有一段由傳統轉向現代的過程。「社會」是中國原有的詞彙。「社」與「會」二字分別指涉不同的意義，也有重疊處。二字都涵括土地神、迎神賽會、友朋團體、聚合之意。經長遠發展，二字涵義漸趨一致，表達各種群眾因不同目的，聚集結成團體的狀態。¹⁸ 這兩個字合為「社會」一詞，古用法多意指「春秋社日迎賽土神的集會」，後遂延伸為泛指各種集會。¹⁹ 描寫北宋都城生活的《東京夢華錄》，行文裡的「社會」就為此意。²⁰ 另在清人輯成之《宋會要輯稿》裡，亦能尋得以「社會」表述「迎神賽會」。惟其行文意涵則有否定「社會」的味道。如「祠賽社會」一詞，敘述者均是描寫地方上的「祠賽社會」，致使「無知小民」得聚眾滋事，甚且踰越地方秩序的界線。²¹ 又有著述者描寫，宋代秘密宗教「喫菜事魔」改名為「結集社會」，「以社會為名」群集橫行於鄉野之間。²² 和宗教群眾活動有較密切之關聯，且易引起官吏

¹⁷ John Holmwood, “Society,” in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ed. Bryan Stanley Turn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92-593. 亦可參見此二詞條解釋：Larry Ray, “Society,” in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ed. George Ritzer and J. Michael Ryan (Chichester, West Sussex, U. K.; Malden, Mass: Wiley-Blackwell, 2011), 592; Steve Bruce and Steven Yearley, “Society,” in *The SAGE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ed. Steve Bruce and Steven Yearley (London: SAGE, 2006), 286.

¹⁸ 陳寶良：《中國的社與會（增訂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5。

¹⁹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編輯委員會編：《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頁223。陳寶良：《中國的社與會（增訂本）》，頁19。

²⁰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收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頁164-165。

²¹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影印民國25年前北平圖書館重印本），頁768；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影印民國25年前北平圖書館重印本），頁6516、6540。

²²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7冊，頁6551、6555。

注意與反感，似乎是「社會」的部分特徵。總的來看，傳統漢語脈絡裡的「社會」，一方面是城市生活裡的迎接神明之集會，更是在統治者角度看來，帶有宗教信仰、神祕性的聚會，恐有擾動甚或破壞地方秩序的可能。

近代日本這條轉介管道，關乎「社會」一詞與“society”，「社會學」和“sociology”對譯關係的確立。至是，「社會」一詞進入人們關於學術知識和國家、人群組織、區別的想像視野中，方始逐漸完備了該詞的「現代意義」。今有研究者指出，「社會」於近代日本的歷史，是一段從未有「社會」概念進至「社會」一詞、義定型、普及的過程。自18世紀70年代始，約至19世紀60至80年代，通過眾人對此概念的想像，學者遊歷西方的經驗，學習近代西方社會科學此些方面，日本學人方始較為穩定地使用「社會」一詞作“society”的翻譯。²³ 其後，「社會」這個原是日本從古漢語轉借生成的新名詞，又經由中、日文化交流的諸多管道，回到中國的語言環境。²⁴

用來翻譯“society”、具備現代意義之「社會」的誕生，過程中伴隨著許多其他詞彙的競爭。據學者觀察，約自1874至1877年間，這段時間是指涉現代意涵的「社會」出現、發展的時段，其中各有不同學人於論述或翻譯時使用「社會」。²⁵ 多數討論都會注意到，《東京每日新聞》的主筆記者福地源一郎（Fukuchi Genichirō，1841-1906），他在報刊雜誌上首次使用「社會」作為論述工具後，其後，「社會」就愈常見於這類新式媒體上，逐漸成為一個指涉相對於官方範圍的領域。²⁶ 只是，同時還有其他詞彙被不同論者使用，或是同一位譯者，譯詞卻不固定的情形。如福澤諭吉

²³ 木村直惠著，顧長江譯：〈「社會」概念翻譯始末——明治日本的社會概念與社會想像〉，收於孫江、陳力衛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二輯）》（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頁138-141。

²⁴ 劉禾稱之為回歸的書寫形式外來詞。劉禾（Lydia H. Liu）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頁426。

²⁵ 「社會」一詞的幾種使用方式，請參見齋藤毅：《明治のことば：文明開化と日本語》（東京：講談社，2005年），頁192-198。

²⁶ 期間詞彙、概念的複雜變化，請參見木村直惠著，顧長江譯：〈「社會」概念翻譯始末——明治日本的社會概念與社會想像〉，頁149-152。

(Fukuzawa Yukichi, 1835-1901) 譯「世間」、「人間交際」、「社會」；西周 (Nishi Amane, 1829-1897) 使用「人間相生養之道」。²⁷ 這些其他選擇，如「人間相生養之道」、「交際」、「世間」，是立基於「人與人之間具體相互關係的高度想像力」上，雖體現一種從儒家傳統來溝通、批判西方近代思想的作為，但概念所指卻仍過於寬泛，亦僅停留於描述一種人際往來、互動運作關係的理想原則。²⁸ 此見，翻譯語彙的競賽，還可能牽涉思想交流的問題。而「society——社會」對譯關係的固著，就還與“sociology”這個新式詞彙、知識內涵逐漸形成專業學科的問題相關。

和“society”的命運相似，當時約有四個“sociology”的譯詞：人間學、交際學、世態學、社會學在競爭。²⁹ 辭典內學科名稱之更替，就體現了這個翻譯語彙變動的過程。1881年，井上哲次郎 (Inoue Tetsujirō, 1855-1944) 與有賀長雄 (Ariga Nagao, 1860-1920) 合編的《哲學字彙》中，對應“society”的漢字詞為「社會」，“sociology”是「世態學」。³⁰ 同年，東京大學以「世態學」正式定為社會學課程的專名，由美國哈佛大學的教師芬諾洛薩 (Ernest F. Fenolosa, 1853-1908) 講述。³¹ 其後，「世態學」此一廣泛指涉「人類世界」的詞彙，漸被「社會學」較專限的名詞取代。³² 如

²⁷ 川合隆男：〈付：解題 近代日本社会学史叢書 第1期・草創期（幕末—明治初年）、生成期（明治10年代—30年代）のこと〉，收於橫山源之助著，近代日本社会学史叢書編集委員會編：《近代日本社会学史叢書：海外活動之日本人》第38卷（東京：龍溪書舍，2008年復刻版），頁16。

²⁸ 木村直惠著，顧長江譯：〈「社會」概念翻譯始末——明治日本的社會概念與社會想像〉，頁143-146。

²⁹ 川合隆男：〈付：解題 近代日本社会学史叢書 第1期・草創期（幕末—明治初年）、生成期（明治10年—30年）のこと〉，收於橫山源之助著，近代日本社会学史叢書編集委員會編：《近代日本社会学史叢書：海外活動之日本人》第38卷，頁16。

³⁰ 井上哲次郎編，有賀長雄增補：《哲學字彙》（東京：東洋館，1881年）。「近現代漢語學術用語研究資料庫」，網址：http://mcst.uni-hd.de/search/searchMCST_short.lasso，檢索日期：2013年9月12日。

³¹ 山下重一：《スペンサーと日本近代》（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83年），頁125。

³² Douglas Howland 在書中提到幾種相關的日本研究，有學者認為「世態」是一個指涉武士階級的詞彙，亦有人認為它是指涉「所有人類」。而柳父章則指出：和其他詞彙相比，「社會」反倒是一個相對新且無意義的詞彙，和已有既定涵義的「世態」相比，更為適用以翻譯“society”。See Douglas R. Howland, “Notes,”

1884年，同樣兩位編者修訂的《哲學字彙》增補版，書中對應“sociology”的詞目就改為「世態學社會學」。³³但值得注意的是，該年，井上哲次郎修訂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編纂之字典出版的《訂增英華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他並未增加“sociology”此詞條；他亦無更動羅存德於《英華字典》中譯定「society——會」（作者按：「會」係用以指稱宗教結社相關集會）的用法。與“society”相關之詞群，井上仍延續羅存德的選詞。³⁴這顯示了，「社會」／「社會學」此譯語仍不穩定。

世態學與社會學的競爭，不僅體現在詞典編纂上，也於學術機關裡上演。至1885年2月，東京大學文學部進行學科課程的修改，才將「世態學」更名為「社會學」。³⁵這一年前後，原先堅持「世態學」的知識分子如有賀長雄、井上哲次郎，也逐漸接受「社會學」。幾本譯自社會學家斯賓塞的作品，也譯為「社會學」。³⁶十餘年後，以「社會」、「社會學」為名的學人社群，先後於1896、1898年成立「社會學會」、「社會學研究會」，主事者分別為布川孫市（Nunokawa Magoichi，生卒年不詳）和加藤弘之（Katō Hiroyuki，1836-1916）。其為研究各類「社會問題」創辦的專業雜誌，就是以「社會」／「社會學」命名。³⁷至是，「社會學」終不需和「世

Translating the West: Language and Political Reason in Nineteenth-Century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243n70. 註釋提及柳父章的論點，請見柳父章：《翻譯語成立事情》（東京：岩波書店，1982年），頁17-19。作者按：實際查核後發現，柳父章是比較「社會」與「世間」兩個詞彙，而非「世態」。

³³ 井上哲次郎編，有賀長雄增補：《哲學字彙》（東京：東洋館，1884年），頁118。日本國會圖書館「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資料庫，網址：<http://kindai.ndl.go.jp/info:ndljp/pid/994560>，檢索日期：2013年9月12日。

³⁴ 羅存德（Lobscheid, Wilhelm）著，井上哲次郎訂增：《訂增英華字典》（東京：藤本次右衛門出版兼發行，1884年），頁987。「英華字典資料庫」，網址：<http://140.109.152.25:8080/mhdata/index.php>，檢索日期：2015年12月14日。

³⁵ 川合隆男：《近代日本社會學の展開：學問運動としての社會學の制度化》（東京：恆星社厚生閣，2003年），頁57。

³⁶ 川合隆男：《近代日本社會學の展開：學問運動としての社會學の制度化》，頁56-57。宮永孝：〈社会学伝来考——幕末・明治の社會學（1）〉，《社会志林》第52卷第3號（2005年12月），頁174-177。

³⁷ 川合隆男：《近代日本社會學の展開：學問運動としての社會學の制度化》，頁59-76。雜誌運作時間為1897至1903年，先後有《社會雜誌》、《社會》，

態學」並列。1903年，東京大學就設置了「東京帝國大學社會學研究室」此學術單位。³⁸此見，「社會」／「社會學」從與「人間學」、「交際學」、「世態學」競爭中脫穎而出，實是反映了核心概念及學科之翻譯語彙於近代日本的確立，與知識和學科轉型、建制的過程，若合符節。

「society——社會」的確立，與「社會學」於明治日本學術界的成形，緊密相繫。此處所使用的資料，尚無法說明譯詞確立背後可能存在的思想史意涵。³⁹我們唯能從中看到一條翻譯詞語釐定的發展路徑：先是透過各類新式報刊媒體、雜誌的言論空間，再受字典編纂與學科建制的影響。特別是後兩者，起到一定程度的統一、定著作用。傳統漢語脈絡裡的「社會」，多半是泛寫多人集合的群體或集會。明治日本時期借用「社會」對譯“society”的做法，才讓這個傳統詞彙包含的概念及指涉範疇，起了變化。「社會」可用來描述不同性質人群結成的團體。⁴⁰「社會」還必須被學人進一步定義與詮釋——其如何形成，是否須具備特定要件，是否存在可界定的範疇。它本身更是一個必須「問題化」的研究對象。此致，總的來說，「社會」在這段時間漸次轉為一個可用以解釋、描繪近代日本國家內部問題的詞彙。而當「社會」與「社會學」在明治日本語境內逐漸譯定時，其亦隨中、日兩國交流的進程，轉輸入回晚清時論界。

三、晚清語境裡的「社會」：從新名詞到關鍵詞

新名詞的釋義、討論與傳播，是同步進行的。和「社會」在近代日本

後者曾改名為《社會學雜誌》。

³⁸ 宮永孝：〈社会学伝来考——幕末・明治の社會學（1）〉，頁177。

³⁹ 宮永孝的論文裡，兩處徵引井上哲次郎的談話。井上皆表示，當時他總覺得在「社會」加上一個「學」字是相當奇怪的，於是他就自己編訂的《哲學字彙》中使用「世態學」。這樣的譯法，還得到加藤弘之的支持。據此，筆者並不認為這個問題，現階段已經得到一個完滿的解答。唯此非本文所能處理的範疇，只能留待他日。宮永孝：〈社会学伝来考——幕末・明治の社會學（1）〉，頁174-175。

⁴⁰ 當時確實出現各種群體特質的「社會」此類書寫方式。齋藤毅：《明治のことば：文明開化と日本語》，頁191。

的傳布方式相似，報紙、雜誌這類新式媒體，確是新詞彙流通四方的平臺。於此，「社會」進入撰述者的語言思考邏輯內，於其寫作時轉成各樣詞組、論述，各自表徵了相異的意涵。這是一個從「新名詞」轉為「關鍵詞」的過程，其中，「社會」緩漸地成為了清末文論界內的一「規範性詞彙」。⁴¹大體上，當時多數關於「社會」的理解，都不離「二人以上之集合體，而為協同生活者之謂也。」⁴²以此為基礎，我們可從當時文獻材料中檢出三種語言運使的脈絡。第一，論者稱「社會」為人類結成群體的一種類型，進而析論其和個人、家庭、國家的階序關係，建構一幅從個人到國家的政治體圖像。第二，逐漸發展出指涉具有共同特徵、傾向或目的的團體或階層。各類與「社會」相關的新詞彙，分別指稱不同人群，並在詞彙的概念層次上，疊合出區辨群體特徵的意涵。第三，串連「社會」相關的詞彙，共同交織出公與私的對立，凸顯經濟分配不均，從而描寫不平等的現象。

「社會」作為描述群體、階層關聯的工具，觸及「個人」、「家庭」、「社會」與「國家」幾種範疇的連結。一篇日本哲學家井上圓了(Inoue Enryō, 1858-1919)談東、西洋倫理學的文章，部分是關於兩方世界構想倫理觀念的原始基點。井上氏指出，東、西洋分別是以家族與個人為社會的單位。此可推測，時人閱覽之際，已可見悉「個人」、「家族」、「社會」三者間可能存在的階序層疊關聯。⁴³還有介紹教育的文論，因討論教育施及範圍而環繞著「學校」此單位，描述「社會」、「個人」、「家庭」的涵蓋範圍。如譯介明治日本教育改革情狀，論者指出，維新前的教育是只有「個人的」，沒有「社會的」、「國家的」思想。⁴⁴ 著眼於時人恐缺

⁴¹ 潘光哲：〈「殖民地」的概念史：從「新名詞」到「關鍵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2期（2013年12月），頁55-92。

⁴² 酌癸：〈新名詞釋義〉，《浙江潮》第2期「附錄」（東京：浙江同鄉會編輯部），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1903年3月18日），頁2-6。收於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浙江潮》總第1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頁182。

⁴³ （作者不詳）：〈井上圓了氏之東洋倫理與西洋倫理之差別〉，《浙江潮》第2期「雜錄·東報時論·教育」（東京：浙江同鄉會編輯部），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1903年3月18日），頁4。收於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浙江潮》總第1冊，頁182。

⁴⁴ 山田邦彥著，（譯者不詳）：〈學校行政法論〉，《遊學譯編》第2冊「教育」

乏群體視野，「家庭」即成為關注焦點。部分看法如「社會者都府之積，都府者家庭之積也。欲求社會，必自家庭為之始矣」，透露「家庭」作為「個人」過渡至「社會」階段的觀念。因此，「無善家庭」就無法形成「良社會」。⁴⁵ 抑有進者，論者在說明學校教育重要性時指出，這個教育場域可為往遊「家庭」和「社會」之「此岸」與「彼岸」之「舟楫」，致使完備一個由「個人」至「家」到「社會」的教育體系。⁴⁶

上舉幾種例子，各有相異的論述脈絡和背景。我嘗試將文句重新脈絡化，觀察材料中的詞彙和語句如何指涉、表述，形成怎樣的觀念性圖景，以此思考新名詞造成的可能影響。就此來論，圍繞著「社會」的相關詞語，是各自區劃出一「既相分離又相關涉」的範疇，拼接成一從小至大、由近及遠的階層鏈結。這番圖景，很適恰地反映於時人呼求改良的聲音上。這是在說，個人是最基礎的單位，其性質優劣決定搏集形成之「社會」的性質。國家的盛衰興亡，更是與「社會之進退」有直接關聯。⁴⁷ 故此，欲救危亡，勢必得自「改良社會」入手。這些論述，最後均指向如何鍛造一個在現代國家內部，「個體」、「家庭」、「社會」是緊密連結，彼此「相生相養」、「通功而易事」的政治秩序。其基本論點就以這幾個範疇性概念構成：「人之生也，立於家庭之中即有家庭之關係；立於國家之中即有國家之關係；立於社會之中即有社會之關係」。⁴⁸

（東京：遊學編譯社出版），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902年12月14日），頁14。收於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遊學譯編》總第1冊（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總頁124。

⁴⁵ 民友社編：〈武備教育（續第二冊）〉，《遊學譯編》第3冊「軍事」（東京：遊學編譯社出版），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頁13、15。收於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遊學譯編》總第1冊，總頁225、227。

⁴⁶ 中島半次郎著，（譯者不詳）：〈論學校對家庭與社會之關係（譯日本中島半次郎教育學講義）〉，《遊學譯編》第8冊「教育」（東京：遊學編譯社出版），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1903年5月31日），頁5。收於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遊學譯編》總第1冊，頁777。

⁴⁷ 沼胡：〈教育私議〉，《江蘇》第5期「教育」（東京：江蘇同鄉會出版部），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七月一日，頁35。收於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江蘇》總第3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頁845。

⁴⁸ （作者不詳）：〈教育汎論〉，《遊學譯編》第9冊「教育」（東京：遊學編

「社會」發揮的第二種語言功用，就是作為指涉共同性質團體或階層的基本單位。誠如金觀濤與劉青峰指出，「社會」使用次數於 1903 年前後達到高峰，其顯著特徵就是，「社會」被「廣泛用於指稱人類生存在其中的某種基本組織結構」。⁴⁹「社會」一詞被大量用於描述不同職業人群，如「農民社會」、「職工社會」、「軍人社會」等例子。《飲冰室自由書》的〈機埃的格言〉篇，梁啟超在評述德富蘇峰（Takutomi Sohō, 1863-1957）書中數條格言，其中有一條就使用「社會」作為區辨不同特徵群體單位的做法。諸如「政治社會、宗教社會、商業社會、勞動社會」，這些「社會」所指的團體，均有相異之「色相」。⁵⁰

這與黃遵憲早些時候在日本的觀察相似。在《日本雜事詩》與《日本國志》裡，先後描述的日本「各立社會」的現象。這裡的「社會」有指涉多種商行社團，更有含括政治、學術、法律、宗教、醫學、從業、商業、藝術、遊戲、人事、展覽等，五花八門的「社會」。在他的理解，「社會」就是合眾人之力、名望、技藝、聲氣以遂其志者。⁵¹黃遵憲的看法，流露了傳統荀子「能群」的思想，以此構成「多人集合形成群體」的概念。其更可能是受到明治日本知識環境的影響，能以「社會」作為描寫不同性質群體的基本單位。⁵²這樣來看，黃遵憲的例子，實恰當地說明了「社會」

譯社出版），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1903年8月7日），頁1。收於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遊學譯編》總第2冊（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865。也有認為「社會」與「國家」是相對性的範疇。海留司烈著，（譯者不詳）：〈社會行政法論〉，收於坂崎斌編：《譯書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年），頁30-36。

⁴⁹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190-191。

⁵⁰ 梁啟超：〈機埃的格言〉，《清議報》第100冊「飲冰室自由書」，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1901年12月21日），頁3b。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6210。

⁵¹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6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光緒五年孟冬同文館集珍版），頁635-636。黃遵憲著，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491-1492。

⁵² 日本知識界裡的這種說法，也透過翻譯傳入中國。古城貞吉譯：〈譯社會〉，《時務報》第17期，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頁23b-24b；古城貞吉譯：〈譯

這個日製新名詞輸入中國語境時發生的些微變化。

在這些例子之外，「上等社會」和「下等社會」的出現值得留意。這兩個詞彙所表徵出的界線和區別，或許是「社會」一詞進入清末中國文字語境所造成的劇烈影響之一。收錄在《清議報》裡的〈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功課〉，作者蔡鐸（1882-1916）在論及人民階級差別問題時，就運用「下等社會之人」、「上等社會之權」，凸顯因「天演」之力所造成不同社會的階級差別。⁵³ 這般現況，直接反應在時人對於教育程度高低的認識及想法。當時有部分出版的書刊，就會說明這份刊物適合哪一種「社會」的人。譬如，上海《競業旬報》第三條簡章自陳，該報論著「力除陳腐，明白發揮」，廣受「上等社會」歡迎；其外，更因報紙容易取得而受到「下等社會」的喜愛。⁵⁴ 書寫上、下等「社會」的字裡行間，就隱隱然流露了區分市民群體的意識。

述及不同「社會」之差異，「上、下等級」是最為便利且明確的語彙。這在晚清諸家時論中，可找到非常多的例子。譬如梁啟超以「下級社會」論述古希臘羅馬文明時代的奴隸；又在他文處將「下流社會」和「勞働社會」擺在相近的水平。⁵⁵ 這些被區隔出來的人群，雖是「一國之主人」，卻「識字者蓋寡」極需智識層面開導。⁵⁶ 這就必須仰賴自 1900 年後數量逐漸增多，「開通中下等社會為宗旨」的白話報刊，以務求淺顯的說理方式，

社會》，《時務報》第 18 期，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1897 年 2 月 22 日），頁 28a-28b。

⁵³ 蔡鐸：〈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功課〉，《清議報》第 29 冊，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一日（1899 年 10 月 5 日）。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編》第 2 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 1872。

⁵⁴ 〈上海競業旬報簡章〉，《洞庭波》第 1 期，收於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二十世紀之支那、洞庭波、漢幟（合訂本）》總第 1 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 年），頁 229。

⁵⁵ 梁啟超：〈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論支那獨立之實力與日本東方政策〉，《清議報》第 26 冊，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初一日（1899 年 9 月 5 日）。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編》第 2 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 1667、1673。

⁵⁶ 〈學生之競爭〉，收於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湖北學生界》總第 1 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 年），頁 0176-0177。

讓「略識之無者」皆能理解紙上新知舊聞。⁵⁷ 這種為「開通下流社會」而大量湧現的白話報紙或宣講單，間接匡顯了一群粗識文字、從事各類勞力工作，等待上層智識社會開智的群體。⁵⁸ 過去的研究者，注意到清末知識階層如何透過各種白話報刊、宣傳品，進行由上而下的啟蒙運動。⁵⁹ 相對的，諸家報紙所指向的「目標讀者」（target reader），無疑就是從識字程度、工作、經濟狀況等角度，間接勾勒出一個不同於辦報人的群體。是一個較特殊且鮮明的「讀者群」。而透過語言給予群體較明確定義的方式，就必須藉由「社會」此一新名詞來釐定界線。

最後一種脈絡性的語言功用，就是用「社會」和相關語詞來描述不平等。這是指隨「社會」一詞傳播於言論平臺的社會黨、社會主義及社會學。活躍於歐洲幾個國家的社會黨人，中國讀者可從報紙內各國新聞編譯選輯得知。《清議報》就接連登載了朝鮮與俄國「社會黨」的新聞，文中描寫該黨為「人群黨，言人群之中貧富不均之不善」，並也聯合勞工、學生發起騷亂，頗有革命之勢。⁶⁰ 至於社會黨在德國活動的消息，國人亦可藉由閱讀留日學生選譯有賀長雄所撰之《近世政治史》的片段，得悉社會黨人於德國政治環境裡的情況；也進而接觸到另一個相關聯的新詞「勞働下等社會」。⁶¹ 於此，「社會」遂將「社會黨人」和「勞働下等社會」兩個新

⁵⁷ 〈智羣百（作者按：白）話報廣告〉，《江蘇》第4期刊末廣告（東京：江蘇同鄉會出版部），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閏五月一日，無頁碼。收於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江蘇》總第2冊，頁791。

⁵⁸ 〈論國語統一之關係及統一之法〉，《大公報天津版》第1版，1904年10月30日。引自「中國近代報刊：《大公報：1902-1949》」資料庫，網址：<http://tk.dhcdm.com.tw/tknewsc/tknewskm> 檢索日期：2017年4月12日。

⁵⁹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頁15-41。

⁶⁰ （作者不詳）：〈再紀朝鮮活貧黨〉，《清議報》第59冊，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1900年9月4日），頁14a。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3785；（作者不詳）：〈俄國內亂〉，《清議報》第74冊，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1901年3月30日），頁10b-11a。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4694-4695。

⁶¹ 有賀長雄著，（譯者不詳）：《近世政治史》，收於坂崎斌編：《譯書彙編》第1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年），頁61。

詞彙，在讀者的閱讀經驗裡，透過「人群」此最簡白的概念基礎，聯結在一起。進而讓「社會」一詞成為界定、透顯某一特色群體的規範性詞彙。

除特指勞動人口外，描寫社會黨人的文字脈絡，也時常是環繞著「平均」、「貧富」的脈絡。例如有文章討論近代日本政黨政治的議題，文中提及了由樽井藤吉（Tarui Tōkichi, 1850-1992）等人組織的「東洋社會黨」。這是樽井這位亞細亞主義者於 1882 年組織的政黨，他也因此舉而被政府以違反政府集會條例監禁一年。該黨就是秉持一種「平等主義」。⁶² 也有作者分析歐洲政局，論及俄國和波蘭的情勢時，就指出波蘭當地亦有「社會黨」組織，同時還盛行一種「社會主義」，專主「均貧富問題」。⁶³ 顯見，「平等」、「貧富」問題與觀念，皆為當時議論及「社會」時側重的面向。

何謂「勞働下等社會」與「社會主義」？有賀長雄對此思想有較詳細些的解說。在有賀長雄描寫社會黨人的脈絡中，前者是指向僱工群體，後者則牽涉較複雜的經濟問題。有賀長雄還述及德國社會黨人的發展歷程，談到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當時德國工人團體。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的譯者自行在章節標題「社會黨鎮壓及社會政策」下註解，向讀者說明「社會」就是指為統籌全局情勢，而非單就「一人一家」為計；至於「社會主義」，則是西國學人因見僱傭工受資本案壓迫，造成貧富不均，而求「均貧富制恆產之說」者。環繞著「社會」和「公」、「均」的概念聯結，譯者最後還指中國井田制度，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⁶⁴ 有賀長雄這篇文章，引入了「社會黨」、「社會主義」、「勞働下等社會」等新詞，讓這些詞彙在概念和語境產生聯繫，均表徵「社會」幾近於「公同」之意，且進一步影射出和「公」相對的「私」，與其壓迫之意。

⁶² 〈論日本近時政黨與政府之衝突〉，《浙江潮》第 1 期「學術·政法」，光緒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1903 年 2 月 17 日），頁 39。

⁶³ 孫林：〈斯拉夫人種與條頓人種之競爭〉，《浙江潮》第 2 期「大勢·國際政局」（東京：浙江同鄉會編輯部），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1903 年 3 月 18 日），頁 92。

⁶⁴ 有賀長雄著，（譯者不詳）：《近世政治史》，坂崎斌編：《譯書彙編》，頁 161-164。

隨著「社會主義」逐漸映入讀者眼中，有關「社會思想」的討論隨即出現，在這類論述裡，「社會學」亦被提及。此致，「社會」一詞具有涵納兩種概念層次的可能性。其可表述社會主義、貧富思想的觀念，亦可指涉社會學此知識學問的面向。在一篇談論 19 世紀思想變遷的短文，作者加藤弘之鋪寫兩條思想演變的線索：國家思想與社會思想。前者關乎國家內部權力分配，後者則是貧富差距的問題。加藤氏明確指出，盛行於 19 世紀下半葉的「社會思想」，其實就為「社會主義」。為救濟貧民，免除富人壓迫，法律無法介入此議題，必須仰賴「經濟即理財學者及社會學者」，以謀救濟之法。⁶⁵在加藤弘之的論述中，「社會思想」一詞串聯了「社會主義」及「社會學」兩脈絡。三個與「社會」相關的詞彙，皆環繞著經濟問題；著述者的行文，則讓「社會」和「主義」、「思想」、「學」產生有機聯結，進而交集在貧富問題上。

這也就是「社會」成為「問題」的由來。當時的讀者，透過閱讀翻譯外文報紙的新聞便可知悉，19 世紀的世界，於各角落就存有所謂的「社會問題」。機器生產力量躍進，致使人力資源窘迫，「社會問題」於焉出現。⁶⁶這般問題，是「勞力（工人）社會」，轉變為「資本社會」，造成「社會權力」全數被資本家掌握，勞力者遂生活如奴隸般。是故，求所謂「社會進步」，即是冀求掃除人類世界貧富差距的現象，使其趨於一致。⁶⁷此處提出的「社會問題」，肇因於勞動群體受壓迫的困境。對此，有論者指出，此問題於歐洲近代歷史的脈絡中，會隨著英國、法國革命，以及「社會學說興」而獲得解決。值是之際，世界之全權將會掌握於勞力者手中。⁶⁸

⁶⁵ 加藤弘之：〈十九世紀思想變遷論〉，《清議報》第 52 冊，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1900 年 8 月 5 日），頁 4a-4b。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 4 輯，頁 3785。

⁶⁶ （作者不詳）：〈兩世紀之大觀〉，《清議報》第 59 冊，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十一日（1900 年 8 月 5 日），頁 1a。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 4 輯，頁 3759。

⁶⁷ （作者不詳）：〈兩世紀之大觀〉，《清議報》第 59 冊，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十一日（1900 年 8 月 5 日），頁 1a。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 4 輯，頁 3880。

⁶⁸ 〈勞心與勞力〉，收於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湖北學生界》總第 1

換言之，緊接在「革命」活動後，「社會學」在這段論述裡，就被當成清除「社會問題」的唯一解藥。

綜上所述，「社會」重新進入近代中國的語境內，其所承載的意涵，已漸脫離僅描述祭祀結社、秘密集會的層面。以此「言」所行之「事」，即為描繪眼見所及之世界。在清末中國紛雜的語境裡，「社會」這個新名詞成為時人描寫己身所處世界的語言工具。環繞著「社會」一詞構築成的語言系統，以指稱人類群體集合狀態為基礎概念，建構一幅複雜網絡。在上舉材料裡，環繞著「社會」一詞，人們或可逐漸建立起一套對於己身、家庭、社會、國家這四者之關係的語言邏輯，雖然這邏輯次序可能還未穩定。再者，當時湧現的各色「社會」，上、下流「社會」，這一系列新式詞彙織就的語言、概念網絡，致使原本僅是描述人們群集為團體的用詞，在晚清時候，不僅轉成書寫者擘劃個人與國家間階層關係的規矩工具，亦為用以指涉、衡量、辨區群體的尺度。更甚者，這張語詞網絡還顯透出「社會分層」和「階級意識」思想萌芽的初基。⁶⁹當「社會」從一個清末時際的「新名詞」轉為「關鍵詞」時，遂賦予了言說者重新認識和理解其所生存之世界內部秩序和結構的能力。「社會」一詞所發揮的規範性力量就如是。

中國內部的人民被這種規範性語言、概念工具劃界為各類不同的群體，「社會」一詞更進一步地挑起人群間的緊張感。這也顯示中國內部正逐漸走上依據群體特質分化的狀況。誠如章清指出，晚清時際出現一系列與「界」相關，依職業、地域區別的語彙：「學界」、「政界」、「軍界」、「省界」。於此可見，人民認同之基準正隨著中國內部分化而離散，並依其職業、特質、地域等要素重新聚合，形成各股游動於國家底下的力量。從語詞層面的角度和資料來論，章清談「界」的問題與本節所論之「社會」在部分例子中是可以互換的。⁷⁰

冊，總頁 404-405。

⁶⁹ 章清與金、劉二氏皆注意到「中等社會」、「下等社會」出現的頻度，自 20 世紀初起後，欲趨頻繁。請參見章清：《清季民國時期的「思想界」：新型傳播媒介的浮現與讀書人新的生活形態》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頁 181-192。

⁷⁰ 章清：《清季民國時期的「思想界」：新型傳播媒介的浮現與讀書人新的生活

而用以描述不平等的「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黨」，以及「社會學」，這幾個詞彙依存的語言脈絡，更成為閱聽者瞭解甚或鼓吹革新世界的工具。這主要表現在，說明公／私相對的圖像。人們可自「社會」，推衍出「公」的層面，強調「公眾」、「公有」、「公共」的概念。如一則介紹日本經濟學說概況的新聞，就寫道代表利己的「交易說」與利他之「社會說」兩種類型的論述。著者談及「社會說」，析論這種專意發展「社會之公事」，進而促進整個群體日益興盛的經濟學說法，與傾向個人面向的「交易說」，形成顯著對比。⁷¹這讓「社會」與「公有」相連結，並和「私有」相對的意味，表現的更加明確。也無怪乎，當時輿論界浮現一種以平民，即為「下等社會」為主體，追求階級平等的革命聲浪，其所使用的語言就為「社會魂」。⁷²至於「社會學」，其所能發揮的知識效用，亦隨時論風向逐漸從早期的「合群」，發展至群體內部的利益分配。只是，此般轉變，是與另個傳統詞彙「群」與「群學」在晚清思想言論界的變化，交織在一起。

四、「群學」與「社會學」的相遇： 「複合式語言」的形成

從現能掌握的資料來看，約自 1890 年代起，「社會」、「社會學」兩個概念便從日本傳入中國。同時，中國知識界正熱衷於一股新興思潮——「群學」——一種討論如何促成人民緊密結合為政治、學會團體的學問。於是，「群學」與「社會學」兩個原屬不同語境脈絡，卻均涉及「個體和群體之結合、運作關係」的詞彙、概念，在知識分子的翻譯、詮釋和

形態》上冊，頁 147-181。章清在頁 150、161 兩處，各舉了明治日本與晚清中國的例子，說明「界」與「社會」是可互換的。

⁷¹ 古城貞吉譯：〈日本名士論經濟學〉，《時務報》第 14 期，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1896 年 12 月 15 日），頁 27a-27b。

⁷² 壯遊：〈國民新靈魂〉，《江蘇》第 5 期（東京：江蘇同鄉會出版部），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八月一日，頁 7-8。

使用下，進而產生詞義的混雜。過往論者多集中探問「社會學」如何取代「群學」？試圖理解詞彙改換現象背後可能蘊含的思想、文化意涵。本文不擬討論「改換」的層面，反是轉而思考，這四個詞彙同時在晚清語言、思想語境內運作，其顯透的歷史圖像及意義。筆者認為，「群」、「群學」、「社會」、「社會學」之間不僅有相互取代關係；在概念內涵的層面上，四詞更應有重疊的部分。本節將從四個詞彙於清末的語言、概念網絡相互關涉的角度，討論翻譯和資訊傳播的活動，及其背後的思想文化因素，如何造成新名詞與中國固有詞彙、概念的交織互動，從而讓這四個語彙交疊形成一種理解、討論和表述政治、社會文化問題的「複合式語言」。

（一）「群學」：一套政治與思想文化的語言

較早談「群」與「合群」觀念的，當是康有為。據梁啟超的憶述，1891年康有為在長興萬木草堂講學，「經世學」綱目下就有「群學」。⁷³康有為在1895年11月接連發表的〈上海強學會序〉、〈上海強學會後序〉二文，透露他的「群」其實是提倡一種合人群之力量，促學術成就的宣言。此種「合群」觀，蘊含了荀子「惟人能群」的要素，企圖促使中國人民成群共學，累積智慧。⁷⁴康氏的「群學」，被梁啟超繼承，1896年一篇〈說群序〉，闡明其「群理」。他提出泰西各國擅長的一種「群術」，認為中國必須學習以「群術」治國，群乃得成；若是以「獨術」治之，群乃敗，將使他國得利。文中的「群」，其實就是一個基本單位的「群體」，由「合群」推演至「國群」。⁷⁵還有譚嗣同（1865-1898），也援引荀子之說提倡「學會」。⁷⁶三人筆下的「群學」，是塑造一種群體意識，側重於個體應

⁷³ 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飲冰室合集：文集》第3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65。

⁷⁴ 分見康有為：〈上海強學會序〉，康有為著，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69-170、〈上海強學會後序〉，頁171-172。

⁷⁵ 梁啟超：〈說群序〉，《飲冰室合集：文集》第2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3-7。

⁷⁶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頁100-101。

該緊密結合為群體，並提倡設立學會的必要性。此二方向，顯示這些知識分子談論的「群學」，實為一種實現政治目標的概念工具。

這三人之外，嚴復的「群學」就是較特殊的例子。最重要的是，在他提出「群學」的標籤下，是明確標舉西方社會學的思想。其於 1895 年撰寫的〈原強〉，概要介紹了斯賓塞的社會學，指出其為「宗其理而大闡人倫之事」，是為「群學」。嚴復亦舉引荀子「能群」的想法，說明人類「相生相養」、「易事通功」的道理，這些皆屬「群學」的範疇內。⁷⁷和康、譚二氏同，嚴復亦是援引荀子「能群」的觀念，將斯賓塞社會學接引至中國思想脈絡內，讓社會學這門新知識，與中國政治語境的觀念，聯結在一起。而此種側重社會學與「人之所以能群」之關係的想法，致使嚴復的「群學」雖然是以西方的、斯賓塞的社會學為主軸，但仍與上舉三位知識分子所談之「群學」，產生詞彙相同，卻在概念意涵上有部分相似，部分相異的情況。

此見，「群」／「群學」和「社會」／「社會學」這四個詞彙與概念，在時人的語言、思想脈絡中，四個不同的語言符號，於每位言說／著述者的使用中，會運作出可能相異、相似甚或互相關涉的結果。此現象是肇因於新、舊詞彙並存於同一時間段落，造成語言符號的「能指」（signifier）本身及其「所指」（signified），也就是詞彙最表層的表述形式和其所指涉的意涵，兩者皆是尚待確義的。語言符號的兩面，千般萬樣的組合，在清末中國形成了一個宛若「新名詞雜貨店」般的語彙世界，任由每位欲演說、議論、寫作者取用。⁷⁸在詞彙的「能指」層面，我們可以看到像梁啟超曾不止一次地從「群」或「人群」的角度，互釋「社會」。⁷⁹復有作者

⁷⁷ 嚴復：〈原強〉，嚴復著，王棊主編：《嚴復集》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6。

⁷⁸ 遠東過渡客：〈新名詞之雜貨店〉，《杭州白話報》（杭州：杭州白話報館），1902 年，頁 17-20。

⁷⁹ 梁啟超：〈論中國人種之將來〉，《清議報》第 19 冊，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1899 年 6 月 25 日），頁 5a。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 2 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 1191。梁啟超：〈飲冰室自由書〉，《清議報》第 37 冊，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1900 年 3 月 1 日），頁 2a。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

是以「社會」來譯解「群態」。⁸⁰ 顯見，「社會」與「群」二詞互換解釋的情形，應是十分常見的。

《清議報》登載了一篇文章，是當時成立於東京的「大同高等學校」的課程講義示例，著者可能為報館編者群之一。其立論基調與梁啟超日後談論史學改良的內容頗為相近。事實上，梁啟超就為該僑校的發起人之一。此文敘述方式的一篇文章，就交替使用「社會」、「群」與「群學」。文中指出，中國人寫史太過於重視「十七姓家譜」，忽略「推原人群發達之所自」，導致中國的「群學」仍是晦暗不明。「群學」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今日是一個「人與人爭之一大社會」的時代，為保存中國，必須注重「群」所表徵之大義。於此，此文頒示的講義內容，即包含「世界文明史」與「人群發達史」。希冀讀者能從人類群體、文明演進發展的角度，認識歷史。⁸¹ 這段文字顯示，「群」和「社會」的意思相似，其實是作者交替使用的策略。環繞著「群」的概念，作者表達出藉由「群學」以創建一良好「社會」的期許。而判斷「社會」的基準，就為流行於近代日本、中國的線性進化歷史觀。

清末知識分子在論述中使用「群」的時候，語句多半是沿著「合群」的角度展開，論題亦是圍繞著「群體」、「強國」。於此種語境內，「群學」和「社會」所指涉的概念，也多半就融入人們理解如何結成一強固、文明的群體，乃至於國家的面向。於是，中國人能否合為一「群」或「社會」，就是一個關乎國家存亡的課題。談及「合群」與否，論者往往會觸及人和禽獸的區別。此想法是源自於荀子「能群」此觀念。如一篇批評湖南人缺乏「合群性」竟會自相戕害的文章，作者陳家鼎（1876-1928）就

刊》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2385。

⁸⁰ 望月鶯溪稿：〈對東政策〉，《清議報》第14冊，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初一日（1899年5月10日），頁6a。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叢刊》第1輯，頁859。

⁸¹ （作者不詳）：〈擬東京大同高等學校講義錄敘例〉，《清議報》第34冊，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1900年1月30日），頁1a-3a。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叢刊》第3輯，頁2184-2187。

指出，人與禽獸的差別就在「能群」的觀點與否。湖南人當時所生存的時代，是一個以「團體思想」為重之「群治主義」的環境。其所對應的，就是西國人稱之為「群學」，日本人名之「社會學」的一套學問知識。⁸²就陳家鼎的文脈看來，「群學」和「社會學」是相通的。但詞面上雖是指涉「社會學」(sociology)，其實際表述的意涵，仍是「群」與「能群」的話語。此見，陳氏認識、理解「社會學」的進路，實無法脫離清季時空環境下，那種強調「合群」的政治氛圍。

上舉的幾個例子，「群學」、「群」、「社會」是普遍交替出現在文字脈絡內，「社會學」也偶爾被論者直接對等於「群學」。就此而論，「群學」此詞彙、概念的出現和大量被討論，應與「社會學」進入中國語境的步調，相去不遠。「群學」是清末知識分子普遍認識且接納的語詞和想法，多數人均是立基於傳統思想資源荀子「能群」的觀點，討論此說。康、梁、譚是如此；嚴復則是將「群學」、「能群」與斯賓塞「社會學」相銜接、會通的要者。四個相關聯的詞彙，在字面也就是「能指」的層面是相互關涉，可互換的；在「所指」的層次，卻是由「群學」較廣泛地指涉相關之意涵。以「群學」為中心展開的政治、學術語言，在晚清言論界的脈絡裡，代表著一股呼求人民要且能成群的聲音，這股聲音是放諸四海、睽諸過往皆準的。於此，中國人必須「成群」，方能躍升至世界的平臺，與西國競爭；甚者，中國的歷史，也必須經由「群學」標準的檢驗與重新挖掘、組織，方始得以顯透過去未曾發現的片段。

(二) 從群學「轉向」社會學

這個「轉向」的故事，還是要從康有為談起。康氏最遲於1898年發表的〈日本書目志〉，其中「政治門」類目下，就編列了21本社會學相

⁸² 鐵郎(陳家鼎)：〈二十世紀之湖南〉，《洞庭波》第1期(東京：中國留學生會館)，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四年九月一日。收於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二十世紀之支那、洞庭波、漢幟(合訂本)》總第1冊，頁139-140。

關書籍。行文敘述中的「社會學」，還是側重「群」、「立會」的觀念。在康有為的想法中，「會」是最原始的形態，由其逐漸形成較大的群體，成為國家；較小的部分遂為公司或社會。社會學這門學問，是學習如何統和大、小群體的道理。在他看來，群體大、小之別不是最重要的，只要善於統和其「會」，就得強盛。文中他更舉西方國家為例，指其強盛之因就為「社會」之故。有趣的是，康氏接著談及各種「會」的形式，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十二萬金之商會）、基督教會，以及其他分業協會。隱隱然，康氏筆下的「社會」、「社會學」內涵的概念，似乎仍不脫他所側重的「學會觀」；雖然是使用「社會學」的符號標籤，但指涉之內容卻與先前談及的「群學」，頗為相近。⁸³

此後，「社會」、「社會學」這組概念，越來越常出現在晚清書文、報刊上。譚嗣同在 1896 至 1897 年寫成的《仁學》，書中談及社會學是欲習仁學者當通曉的西書之一，與「新約、算學、格致」等書籍並列其中。⁸⁴報紙上的書籍廣告，就形容該書為譚嗣同博覽泰西格致學、法律學、政治學、社會學、哲學……以及聲光化電各種專門名家之書，薈萃集成。⁸⁵1899 年，歐榭甲（1840-1911）和梁啟超這兩位清議報的主要作手，兩人因旅居日本之故，在大量新名詞的洗禮下，文章會產生兩種詞彙混用的狀況。像歐榭甲描述幾門西方學科，「凡政治學、資生學即理財學、群學即社會學、法律學」。⁸⁶梁啟超解釋「西國學校」應教授的「致用之學」，論及「群

⁸³ 詳見康有為：《日本書目志》，收於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 3 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335-336。關於康有為的「社會」一詞，沈國威指出，康氏是錯用了該詞之義。承紅磊的論點與筆者相近。他分析康有為同時期編譯的《日本變政考》，指出該文本內的「社會」一詞，是延續中文傳統用法，且偏重「結社集會」的主張。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260。承紅磊：〈康有為與「社會」一詞的再使用〉，《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7 期（2014 年 12 月），頁 299-326。

⁸⁴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頁 9。

⁸⁵ 〈新刻譚壯飛先生仁學全書出售〉，《清議報》第 85 冊，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一日（1901 年 7 月 16 日），無頁碼。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 5 輯，頁 5383。

⁸⁶ 無涯生：〈勸各地立祀孔子會啟〉，《清議報》第 11 冊，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初

學、國家學、行政學、資生學、財政學、哲學」。⁸⁷再者，任公向讀者推崇學習日文，俾便接觸日文寫作的西方新學，就提及「群學日本謂之社會學」。⁸⁸此見，論者在談及「群學」之名時，不時便會夾註解釋此即為日本稱之「社會學」。

至是，「社會」與「社會學」在清末之際，數量是頗為可觀；但「群學」仍有一定的使用者。不過，大體而言，部分史料中的語言和論述，已有限度的觸及「社會學」作為一門新興知識的內涵與功用。有介紹哲學內涵的文章，述及諸家論者對社會學的看法；有認為其是「有機的物理學」；另有斯賓塞視其為「具體的科學」；美國學術界則認為社會學是一種「具體、歸納」性質的科學。該文總結道，社會學是屬於「說明的科學」，同屬其中的還有「言語學、史學、人類學、財政學」等科目。⁸⁹亦有介紹「衛生學」的概論文章，文末談及衛生學與其他學科的關聯，總共談了十三種科目，最後談及社會學。該文沿用「上等」、「下等」社會的區別，指出每類型的「社會」均有特殊環境習慣；必須仰賴社會學熟查各社會狀況，方能以衛生學對症下藥。⁹⁰大抵上，這些報紙材料確是顯現了對於「社會學」這門新興學科，當時還未能建立系統式的理解。

或許，因著這種模糊不清的認識狀況，使人們對於「社會學」的內容及功用，多了些想像空間。當時有許多言論，都顯現了時人是在「社會學與晚清政治、社會革新之關係」的關懷前提下，接觸和想像此門知識。也

一日（1899年4月10日），頁3a。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1輯，頁647。

⁸⁷ 哀時客：〈愛國論一〉，《清議報》第6冊，光緒二十五年一月十一日（1899年2月20日），頁3b。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1輯，頁324。作者按：哀時客為梁啟超筆名。

⁸⁸ 哀時客（梁啟超）：〈論學日本文之益〉，《清議報》第10冊，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1899年4月1日），頁3b。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1輯，頁579。

⁸⁹ 侯生：〈哲學概論〉，《江蘇》第4期（東京：江蘇同鄉會出版部），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閏五月一日，頁48。

⁹⁰ 普澄：〈衛生學概論〉，《江蘇》第3期（東京：江蘇同鄉會出版部），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四月一日，頁86。

就是說，社會學常為論者援引來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譬如，論者會援引社會學知識討論國人如何自治，克服「對於社會，不知我身之關係」的毛病。⁹¹不過，該文並未言明究竟何為社會學。報刊的章回小說亦有相似情況。在《浙江潮》連載的小說〈愛之花〉，是描寫一位中國青年才俊於法國擔任外交官的愛情故事。有趣的是，該位作者宣稱他平日「喜研究社會學」，認為這種知識具有「統制群治」的功效。國人欲行任何改革，皆需先從社會學著手。⁹²但其連載內容並未出現任何與社會學相關的字句。僅能間接推測，作者透過小說主人公的角色，譴責晚清中國每一個僅為己身工作、權位、愛戀著想，不顧「群治」大局的可能讀者。顯然，「如何治群」仍是引導多數論者想像社會學之內容、用處的主要提問。只是作者是用新詞彙來表述其對「群學」的關懷與期待。

這兩則隱微觸及「社會學和群體問題關聯」的例子顯示，論說者雖已在語言操作上轉換至社會學此一名詞標籤，但其心中所思所想，或仍未離開晚清時論界的重要議題——「群學」。1903年，由留日學生汪榮寶（1878-1933）與葉瀾（1875-?）編纂的辭典《新爾雅》，更清楚反映了這般關懷，或可說是「限制」。這本「詢臨文者不可不備之書」，是由各學科專家分別「廣蒐術語，確定界說」，編入現代知識體系裡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邏輯學……共十四門學科的專業語彙。⁹³惟編纂者是模仿古字書《爾雅》的書寫邏輯，讀者翻閱時，映入眼簾的反倒是依循「釋政、釋計、釋群、釋名」此傳統體例的文句。

不過，《新爾雅》的內文是充滿大量的日本新名詞。換言之，這部辭書實是通過多方選擇、編譯流通於日本市場的西學書籍而成的。但特別的

⁹¹ 重堪：〈自治篇〉，《浙江潮》第6期（浙江：浙江同鄉會編輯部），光緒二十九年六月二十日（1903年8月12日），頁3、9。

⁹² 儂更有情：〈愛之花〉，《浙江潮》第6期（浙江：浙江同鄉會編輯部），光緒二十九年六月二十日（1903年8月12日），頁1-2。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家周瘦鵬（1895-1968）曾將這部小說改編為戲劇，投稿至《小說月報》，自1911年11月25日至1912年2月12日，連載刊登。

⁹³ 〈國學社已刊書目廣告〉，《江蘇》第4期，東京：江蘇同鄉會出版部，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閏五月一日，缺頁碼。

是，書中「釋群篇」，編者似乎是避免使用日式新詞。其釋義方法，總是先提「群」再補述「社會」。如該篇開頭「二人以上之協同生活體，謂之群，亦謂之社會。」「研究人群理法之學問，謂之群學，亦謂之社會學。」⁹⁴編者在「群」、「群學」的語言邏輯上，重新將其於日本蒐集到的書文，從「社會」、「社會學」的寫作脈絡轉譯為此般樣貌。於是，讀者於閱讀之際，實是在傳統語彙脈絡下，認識「社會」和「社會學」的內涵。這包括了社會形成之緣由、社會運作的理想狀態、進化演變的理則、組成與變動的要素，以及社會學研究方法此些面向。⁹⁵據此而論，《新爾雅》的介紹雖堪稱全面，著述手法卻顯現書寫者徘徊在新、舊詞彙、概念間的痕跡。

這部辭書揭示幾個思考「新名詞」的問題：在這種文字語境中，讀者接收的究竟是「群學」／「群」抑或是「社會學」／「社會」？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能否無礙地互換兩詞彙，於概念層面上可互相解釋？接下來，我將透過幾則材料和例子，綜合前面的論述，試著回答這提問。我更會試著修正提問，讀者在新舊詞彙交互出現的敘述裡，究竟能接收到怎樣的資訊？當時讀者從紙面上看到的，應該就是「群學與社會學」並置共構而成的圖像。近代以降，大量湧入中國的新名詞與概念，引發人們於閱讀、寫作之際的選擇與考量，以及諸多環繞著新詞的疑問、釋義或在不同語境中使用的例子。就是此些討論所反映，一種在中、西思想文化交織脈絡底下，由新、舊詞彙、概念組構形成的「複合式語言」，用來思考、議論時境，且進而提出幾種相關連的「問題群組」，才是諸多新名詞映入時人眼際耳邊的複雜樣態。

這部分的討論，仍得脈絡化解釋「社會學」如何進入時人思想視野，論述語言之底蘊，是否保有「群學」的色彩。我認為這反映在「社會學蘊含之進化觀念和史學」、「社會學與中國傳統思想資源」上。「社會學、

⁹⁴ 沈國威編著：《新爾雅：附解題·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總頁247。沈國威認為，兩位編者似乎是刻意避開「社會」此一譯語。請見此書，總頁31。目前我是同意沈國威的觀察。

⁹⁵ 沈國威編著：《新爾雅：附解題·索引》，總頁246-247。

進化觀念、史學」的思想關聯性，近代日本是重要線索。簡言之，近代中國的史學，在明治日本「文明史學」的影響下，是種以濃厚進化思想的斯賓塞社會理論為依歸，試圖省察國家「文明史」的方法。同受日本思潮影響的章太炎、梁啟超，都關注「社會學」／「群學」之於史學研究的助益，側重如何藉西學新知，考掘深埋於中國長遠歷史裡那條標誌「進化文明」的線索。⁹⁶

梁啟超撰寫的〈新史學〉，就強調歷史研究應該側重於挖掘「人群進化」之現象、公理和公例；歷史學與其他學科，包括「群學」的關聯性。⁹⁷ 梁氏此時是在「群學」語言邏輯下，論述史學和社會學研究的關係。但是，梁氏此階段的「群學」，和早年承襲康有為的「群學」內容，不盡相同。詞彙標籤雖未更替，內涵已逐漸滲入西方社會學，或者說以進化觀念為依歸的社會學。⁹⁸ 梁啟超討論中國歷史書寫的方法，雖是採循傳統語彙的脈絡，卻是同時向中國讀者展示了「群學」、「社會學」兩種概念。不過，很快地，梁啟超就逐漸接受新詞彙，這自然是大量日本書籍潛移默化造成的。民國時期，當他再度論及學者該以怎樣的眼光審視史籍材料《左傳》，此時他的答案就是「以社會學者的眼光」。⁹⁹

章太炎是採取「社會」的邏輯來翻譯和寫作。章氏於 1902 年翻譯出版岸本能武太（Kishimoto Nobuta, 1866-1928）的《社會學》，¹⁰⁰ 就是將

⁹⁶ 見大久保利謙：《近代史學の成立》（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 年），頁 109-134。已有不少研究指出，晚清「線性史觀」是在日本「文明史學」的影響下出現，如王汎森：《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 年），頁 52-53；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收於徐興慶編：《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年），頁 285-291。

⁹⁷ 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第 4 冊，頁 7-11。

⁹⁸ 宋學勤：〈梁啟超與社會學〉，頁 95-101。

⁹⁹ 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收於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第 15 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頁 59。

¹⁰⁰ 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譯：《社會學》（上海：廣智書局，1902 年），自序，頁 a-b。關於章太炎翻譯岸本能武太社會學的相關研究，請見韓承樺：〈從翻譯到編寫教科書：近代中國心理傾向社會學知識的引介與生產（1902-1935）〉，收於張仲民、章可編：《近代中國的知識生產與文化政治》（上海：復旦大學

此知識視為歷史著述的工具規矩。誠如他對梁啟超所言，社會學書籍實能輔助他審視史料，掘發「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¹⁰¹ 據此，章太炎對岸本氏社會學的肯定和梁啟超相同，均出於對歷史著述準則、方法的關懷，以及史學對於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重視。顯然，兩人關於「群學」抑或「社會學」的想法，均與中國傳統史學有十分明顯的關聯。兩位知識分子，並沒有誰運用較獨特的語言邏輯，而「群學／社會學、進化觀念、歷史學」也明晰地反映了清季時人關心的議題：歷史和群體、進化、文明。

這種結合社會學和史學的想法，後被國粹派學人繼承。社會學思想的影響，概有三個範疇：第一，從進化觀點來審視人類歷史進程，據以結合國學研究中文字、語音、器物的考論釋義，使其與社會學學說，相互証成。第二，藉斯賓塞「社會有機體」論，思考個人、群體與國家結構的關聯。第三，側重於考掘原始社會的歷史，觸及原始社會分期發展的特色和區別，以及家庭宗法制度、國家君權的起源。¹⁰² 如劉師培（1884-1919）先後於 1904、1908 年寫作〈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界〉二文，就透露了此種想法。文字的形、音、義變化，皆銘刻了社會演化的痕跡；研究文字，正可輔助國人理解中國社會「治化進退」、「民體合離」之由來端委，亦得證明「進化之公理」。¹⁰³

「社會學與中國傳統思想資源」的面向，就得注意知識分子是在肯定並援引荀子論述的基礎上，以「群」／「群學」的思考角度來接納並轉釋西方社會學／社會論述的作法。而以此傳統語言和觀念展開之討論，焦點就在「群體形成」上。章太炎在斯賓塞社會進化、有機體論觀點上所構築的「群」，值得注意。他於 1899 年寫作的〈菌說〉，是一篇斯賓塞觀點

出版社，2014 年），頁 130-135。

¹⁰¹ 章太炎：〈與梁啟超書〉，收於章太炎著，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41-42。

¹⁰² 鄭師渠：《國粹、國學、國魂——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頁 81-106。

¹⁰³ 劉師培：〈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界〉、〈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劉師培全集》第 3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 年），頁 243-244、231-242。

濃厚的文章。文章後段，章氏援用《荀子·王制》「合群明分」的觀點，發展出「群」的兩種層次思考。首先，「合群」是為對抗「他族之侮」的自保之法。復次是群體內部秩序。他引用《荀子·富國》中，強調群體內「異體」的存在，必須以「群而有分」來維持政治。著重「分」的想法，能協同墨子「兼愛」、「上同」之善，致使「群」內異體間的「畛域」，即利益的差異，均能調控有節。¹⁰⁴ 在《鳩書》初刻本的〈明群〉篇裡，章氏再度引述《荀子·富國》來闡述「分」的兩層意義。第一是群體內的分工。這是建基於每個體僅能從事一職，方使每人皆得相生相養。其次是說明「分際」，是為使「處群者不亂」。¹⁰⁵ 兩篇文論形成一條清晰的思想線索，章氏立基於中國面臨之困境，試圖思考一套以「合群」為核心，由內至外皆可維持強盛和諧的政治規則。當他欲從進化軌跡中挖掘「群體」形成的歷程時，十分仰賴荀子「合群明分」的觀念，以闡述「群」之成因、方法與目標。

梁啟超則是直接將「社會學」與荀子聯繫起來思考「群治」問題。1906年，他發表於《新民叢報》的〈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旨在藉描述中國先秦時期法理學思想的發展及成果，思考如何適切治理中國內部組織、經濟利益分配、群體互相衝突的問題。文章指出，從三代至春秋戰國之間，歷經一個從「禮治」到「法治」的轉變，由此，他便從先秦諸家學說，描寫「法」的起源。梁氏的主要觀點係《荀子·禮論》中認為禮義制度是用以調控人類慾望，使其於節度下發揮。¹⁰⁶ 他直指荀子為「社會學之巨擘」，以為荀況言「義」，既明確區別人類與動物的差別，也指明人類

¹⁰⁴ 章太炎：〈菌說〉，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潘文奎等點校：《章太炎全集（八）·醫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12-15。章太炎徵引的原文出自〈王制〉、〈富國〉。見熊公哲註譯：《荀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181、193。

¹⁰⁵ 章太炎：〈明羣第二十三〉，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鳩書初刻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51-52。章太炎徵引的原文出於〈富國篇第十〉。熊公哲註譯：《荀子今註今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193。

¹⁰⁶ 梁啟超徵引的原文出於〈禮論篇第十九〉。熊公哲註譯：《荀子今註今釋》，頁419。

具有的「大我」之「普通性」。顯然，在梁啟超看來，荀子之言「義」可消弭「分」的難題，並得以化解個人結成群體後，遭遇因經濟慾望而產生大小紛爭，從而無法結成社會乃至國家的可能。質言之，梁氏此處即要指出，荀子此論果為貫通西方社會學、經濟學、國家學的基本法制觀念。¹⁰⁷

從「社會學為何物」、「社會學與晚清政治、社會革新之關係」、「社會學、進化觀念、史學」以及「社會學與中國傳統思想資源」四條線索展開的討論，是為勾勒新名詞觸及的幾種歷史特徵：文化傳播途徑與源流；新舊詞彙和概念交織；中、西思想學術嵌合；這般會通是為解決哪些學術思想或現實層面的問題。首先，文化輸入的途徑，決定了哪些新名詞、思想進入中國，也影響此後的發展。就像近代日本開啟時人對「社會」、「社會學」的接觸機會。再就詞彙、概念而論，幾位知識分子的語言脈絡，展現了「社會」／「群」、「社會學」／「群學」的混雜。譬如康有為的「社會學」是涵納了較為濃重的「群學」意涵，嚴復恰好相反，而章太炎、梁啟超有較顯著的從「群」轉而使用「社會」的狀況。但得注意的是，梁啟超的例子中有一段「過渡性的改變」，就是西方社會學的內容，逐漸滲入其「群學」的內涵，致使梁氏是用「群學」來表述部分「社會學」的議論。於是，若從概念表述的層次上論，筆者認為這幾個例子所展示的歷史情境，並非僅能從「新舊取代」的脈絡來思考。或可改換角度，思考語彙轉換之際，「新舊並存」所呈現的圖像、成因與意義。這反映何種概念、思想議題。這才可能是晚清新名詞現象所呈現的歷史世界。

思考新舊詞彙、概念並存的問題，即可從知識分子如何脈絡化論述的角度來檢視。這就牽涉「群學」、「社會學」與中國傳統思想學術的嵌合。自日本輸入的「社會」與「社會學」和舊有語境之「群」、「群學」，在當時譯詞未定、概念尚未明確界義之際，是交錯出現在文本中。環繞著「群」的語言和概念，是源發自晚清的政治場域。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所談的「群」與「群學」，是意圖團結個體，打造成各式政治和學問團

¹⁰⁷ 梁啟超：〈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飲冰室合集：文集》第5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47。

體的政治性概念工具。嚴復的「群學」，高舉西方世界、斯賓塞的社會學思想，此與康、梁之「群學」，存有概念內涵上的差距。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嚴復翻譯社會學的政治企圖。¹⁰⁸他使用的「群學」雖代表「社會學」這門西方知識，但若從詞彙、概念作為政治工具的角度來看，嚴復和康、梁二人的差距就沒有那麼遠。這是晚清中國政治氛圍所營造出的共通語境所致。

此外，「群學」和「社會學」也進入時人針對史學研究的反省脈絡中。在這個部分，詞彙和概念的差距就更是模糊。章太炎、梁啟超、劉師培三人論述時，雖選用相異的語彙，但由於他們都浸潤於由社會學思想引入的進化觀點中，此致，三人對於歷史研究、書寫的原則法理，皆肯定以進化論為考掘、衡度歷史發展的準則。而「群」或「社會」亦成為人類歷史演變的一個基準單位。再者，很多的例子都顯示，知識分子不論是開展傳統意義的「群學」，或是滲入西方社會學成分的「群學」、「社會學」，他們都很自然地汲取荀子思想，為其接引、會通西學的資源。多數援引荀子的例子，都發源於「群」，後聚焦於「義」和「分」的問題。「義」、「分」、「辨」、「群」四者，於荀子的思想系統中是相通的；「善分」即「善群」，都代表要以「禮治」盡「外王」之治。而「群」字之義便指向結成群體，且各得其分的意義。¹⁰⁹總此而論，晚清政治、思想環境中的「群學」和「社會學」，它們是西方知識通過文化翻譯東傳，與中土傳統資源會通的成果，既是革新中國傳統史學的良好良方妙藥，亦為知識分子審視周遭環境的尺度。藉此，他們發現中國人民必須按順序由小群轉至大群，再至「有法度之群」，爾後才有「社會」與「國家」。而能遂行此一進化準則的關鍵處，或許就得謹守著「分」的界線，妥洽地規劃、安排中國境內的政治秩序、公共事務以及經濟利益。

¹⁰⁸ 關於嚴復翻譯《群學肄言》的政治意圖，請參見韓承樺：《審重咨學：嚴復翻譯《群學肄言》之研究》。特別是第三章，頁 75-166。

¹⁰⁹ 韋政通：《荀子與古代哲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頁 27-34。

綜上所述，在這個複雜的語言、概念平臺上，「群學」與「社會學」的相遇，顯現出二者或有差異，亦有互釋會通的部分。差異處在於，「群學」係因清王朝衰退而浮現的政治術語，而「社會學」乃是隨著當時大量西學文本譯介進入中國的新式知識。兩者互釋、會通的部分，較為複雜，得區分為原因與如何發生這兩塊。原因的部分，概可從知識分子皆是通過荀子「能群」的概念來構想「群學」，並藉以接引西方「社會學」進入中國語境。這種概念上的親近性，均體現在康、梁、嚴復、章太炎與國粹派學人關於「群學」或「社會學」的論述中；且藉由多樣的言說，展演了「群學」和「社會學」論述在思想目標上的相近：重新整構傳統中國內部群體的秩序。這也就是兩種詞彙、概念在論說者實踐層面上產生的會通。概有兩類型的言論，分別指向現實世界的秩序，以及審視歷史進程的發展軌跡。質言之，過去單從學科知識史、思想史討論「群學」和「社會學」的問題，由於太過專注描寫歷史轉換的段落，而忽視了此轉化過程中的複雜性。在考究「群學」及「社會學」之異同問題時，除描述經過翻譯而在語詞標籤上的差異外，我們還需深究「語義」的層次，兩者實是有交織在概念內涵、論述之思想目標此二層面。

在理解此複雜性的前提下，就得重新脈絡化晚清時論、思想界裡的新名詞與概念，將之想像成一種複合體。新出於晚清語境中的多數語詞或概念，都不會是單一的點。其意義內涵於各類論述裡的展演，皆是在與其它可能是舊的、意義相近，甚至相反的語彙交織互動中體現。於是，「群」／「群學」、「社會」／「社會學」，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的時空環境下，就交匯成一種「複合式語言」，成為論者探看現實世界、想望未來藍圖的視野。這組複合式語言組合的成分，其核心概念是環繞著「群」／「社會」形成；這自是呼應了士子關心傳統中國如何轉型為具有各類同、異質群體，從而漸次疊加組構形成一現代國家。自核心概念延伸來的「群學」與「社會學」，代表了知識分子試圖將「成群」的理想，轉化為一套思想性言論，分別指向了現實與歷史的世界。而疊加這個複合式語言的方式，則是概念內涵，以及語彙形成論述之目標兩者的親近性所致。

清季時人通過這套複合式語言所勾勒出的，是包括進化論、歷史書寫、群體組成與內部秩序規劃幾個議題，組構一個相互關涉的問題群組。此一關乎如何改變世界的問題群組，或許才是晚清各方論者運使這組詞彙時，所思所想的複雜樣貌。這也應和著張灝所言「轉型時代」的特色：藉由新語言討論一些多數人關心問題所形成的新思想論域。¹¹⁰只是，這套「新語言」的展演，實還無法完全脫離「舊」、「傳統」語彙的概念範疇，兩者實是交織在各類論述裡。過往關於晚清新名詞的研究，較多著重新名詞於歷史轉換期間推動的「變」，唯若能結合「變」與「不變」的兩面，才能深化轉型問題的理解。就像「群」／「群學」與「社會」／「社會學」於晚清語境中相遇時，語言和概念的轉化，其具體影響實是在固有語詞與新名詞、概念相遇，開始轉換，新者欲取代舊者的過程中，逐漸產生不同程度的區隔及互釋，形成一套以複合式語言為基礎的，可供士子描繪並嘗試扭轉世界的論述。

五、結論：棋局上的「問題群組」

環繞著「群」／「群學」、「社會」／「社會學」，本文試圖從詞彙、概念史、學科史的角度，在東亞世界知識環流的脈絡中，描寫傳統語彙、概念，和自西方輸入的新式語言相遇，從而發生取代、排斥與互釋的曲折歷程。“society”和“sociology”，於19世紀後半葉方始緩進傳入中國。這是西方古典社會學的發展時期，也正為傳統中國經、史學知識架構崩解，新、舊混雜的知識學說逐漸形成之時。「社會」以新名詞之姿，躍上眾聲喧嘩的思想舞臺，與「社會學」和各類相關的社會理論，形成關於「社會」的新詞彙、概念及知識論域。本文說明，此過程是在跨國界的知識環流基礎上進行，包括知識中介者譯介或書寫者的文本生產工程。以日本作為一個中介點，在大量留日學生協助下，許多「東學」知識被引介回中國。這

¹¹⁰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收於張灝：《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頁53。

些包含新名詞、概念與各類西學新知的「包裹」，是在中國政治、思想環境劇烈變動下被打開，予各方論者開箱取物。

於此，我們必須在晚清政治氛圍和思想脈絡下，解讀這些擴散至層疊語境中的新名詞。文章第二節討論「社會」作為一個演變為「規範性詞彙」的新詞，就是環繞著與「社會」相關涉的詞彙、概念，描寫其被理解及進一步詮釋、挪用的過程。這一複雜歷程，多是體現在 1895 年後，大量湧現於時論界的報刊。此見，「社會」這個新名詞在中國傳散的初步方式，與在明治日本的過程極為相似，均是仰賴報紙這類的言論平臺，才可快速傳散至各方閱讀群體。各類的報紙更是開拓了各種的語境空間，讓「社會」一系列相關詞彙得以展演論述。本文徵引了幾種報紙材料，它們分別展現晚清言論界中改革與革命兩種傾向，如《時務報》、《清議報》、《浙江潮》、《江蘇》。唯雖有此般差異，但呈現於各類報紙中的「社會」，大抵仍是環繞著描寫、介紹「社會／群」的想法；並藉由「社會」展示了新名詞可反覆指涉、概念化和定義其言說的能力，也就是通過「社會」來認識並描繪言說者生活的世界。

本文所言之「社會」一詞的規範性作用，就在新名詞和晚清政治、思想環境的層累互動中逐漸展開。此致，以「社會」為核心，相關聯的「社會黨」、「社會主義」、各種「社會」和「社會學」等詞彙及概念，在晚清時際構組成一套論述系統，它可用以表述新知識，亦可重新區界其人身處之環境；創造一個在「社會」這套「定義性語言」（defining language）所言說和概念化描述的空間。¹¹¹其中，「社會」指涉「公」及「平等」概念的成分，漸於晚清思想界內發酵。除前文所舉的「社會魂」外，劉師培於 1907 年也發表了「破壞社會」的聲音，以此求諸人類世界的完全幸福。¹¹²

¹¹¹ 語言在政治環境，特別是革命浪潮中的競爭與定義問題，本文是參考俄國革命的相關研究成果。請參見 Orlando Guy Figes and Boris I. Kolonitski,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¹¹² 劉師培：〈破壞社會論〉，收於劉師培著，萬仕國輯校：《劉申叔遺書補遺》下冊（揚州：廣陵書社，2008 年），頁 1633-1636。

此見，語言不僅是承載革命浪潮的符號，它本身就推動、觸發了革命。

在「社會」這套「定義性語言」底下，「群」／「群學」與「社會」／「社會學」兩組詞彙、概念相遇互釋，交織為疊合新、舊語詞、涵義的「複合式語言」。這套複合式語言，讓論者能從單純「描繪中國」推進至思考「改變中國」的課題與辦法。本文認為，如果我們能以「複合體」的角度來考慮清末新名詞問題時，那麼關鍵處就不再僅是新、舊詞彙、概念如何／為何轉換，應該是注意新、舊語言在各方言說者運用下，共通地勾劃哪些論述，各類言論是否有交集的議題。於是，我們必須將兩組詞彙並置同觀，而非專注於「取代」的過程。據此，我們或許可以將組成這種語言複合體的兩組新、舊詞彙及使用者，想像成一盤棋局中的兩方競爭者。¹¹³ 前節討論這組詞彙被詮釋及運用於各類言論的幾條線索，就組成了當時知識分子通過這組語彙得以認識並構思的幾個問題：由核心概念「群」／「社會」進至「群學」／「社會學」，個人如何團結為群體／社會？各類群體／社會是否有性質之區別？有無辦法就這樣循序漸進地形成現代國家？國家、社會或群體內部，如何透過有節度的調控管理，疏分經濟利益，建造政治秩序？而如果「進化」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定則，那麼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是否也能依此準則跟上西方國家的腳步？問題群組構成棋面，而棋局本身，就是西力衝擊下中國社會的縮影。諸家論者通過「群」／「群學」或「社會」／「社會學」下這盤棋，各有所示所解。有持傳統意涵之「群學」，亦有持意義尚未明確界定，或是混雜「群學」傳統的「社會學」；甚至如嚴復、章太炎兩種不同思想傾向的社會學論述。¹¹⁴ 他們使用不同的詞彙、語言，在概念上或有區隔、會通，從而展示了相異的觀察社會、政治變遷角度，卻又是立基於高度思想關聯性的問題邏輯上。

¹¹³ 「棋局」的比喻，本文是參考自錢新祖分析焦竑與晚明思想問題的談法。其觀點之原貌，請參見錢新祖著，宋家復譯：《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頁33-34、302。

¹¹⁴ 關於嚴復、章太炎代表的兩種傾向之社會學理論，請參見黃克武、韓承樞：〈晚清社會學的翻譯及其影響：以嚴復與章炳麟的譯作為例〉，收於沙培德、張哲嘉主編：《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頁166-167。

棋局上的問題群組，適度反映中國現代轉型過程的困難，也影響時人對於新名詞、概念與知識的認識。20世紀初，胡漢民（1879-1936）與梁啟超針對「社會主義」、「土地私有／公有」問題的辯論，過程中觸及「社會學」、「社會主義」、「民生主義」三種知識論述的辯難。雙方的論爭環繞著「社會學」知識，是否包括「經濟」／「民生」／「土地」議題，以及「社會學」與「社會主義」的差異。雙方關於知識範疇的爭議，揭櫫了時人對「社會學」的認識及理解，基本上仍然與「公有」、「私有」、「分配」這些「社會問題」交織在一起。¹¹⁵此見，關於「社會學」的定義，還是深陷於這套語言論述和問題群組中。又如康寶忠（1884-1919）的例子，他於1916年在北京大學哲學門講授社會學，是當時第一位在大學開專業課的中國學人。看起來，這門知識已在大學獲得一接近專業學科的位置。但從目前資料所見，一篇他在北大的演講稿，講題為「社會與倫理」，其談論社會學的方法和關懷，仍是環繞著「成群」與「節欲以分」的線索。¹¹⁶這或許是承自晚清知識分子援引荀子思想之「群學」的遺緒。也就是說，「群」／「群學」、「社會」／「社會學」這組「複合式語言」所佈下的棋局，直至民國時期，似還未能解開。

¹¹⁵ 民意（胡漢民）：〈告非難民生主義者〉，《民報》總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影印科學出版社底本），總頁1862-1864。Hailong Tian, “Differing Translations, Contested Meanings: a Motor for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in *A Global Conceptual History of Asia, 1860-1940*, ed. Hagen Schultz-Forberg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4), 51-60. 誠如這篇文章討論「社會的」（the social）的概念，提到孫中山從「民生」角度將「社會的」範疇概念化，是環繞著民眾生活、居住、經濟條件，也就是「社會問題」的範圍。這就導致我們看到〈告非難民生主義者〉裡，胡、梁兩派論述、思想的分野。

¹¹⁶ 關於康寶忠的部分討論，請參見韓承樞：〈當「社會」變為一門「知識」：近代中國社會學的形成及發展（1890-194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7年7月），頁111-115。

徵引書目

- (作者不詳)：〈井上圓了氏之東洋倫理與西洋倫理之差別〉，《浙江潮》第2期「雜錄·東報時論·教育」，東京：浙江同鄉會編輯部，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1903年3月18日），頁123-124。
- (作者不詳)：〈再紀朝鮮活貧黨〉，《清議報》第59冊，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1900年9月4日）。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3785。
- (作者不詳)：〈兩世紀之大觀〉，《清議報》第59冊，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十一日（1900年8月5日）。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3759-3761。
- (作者不詳)：〈俄國內亂〉，《清議報》第74冊，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1901年3月30日），頁10b-11a。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4694-4695。
- (作者不詳)：〈教育汎論〉，《遊學譯編》第9冊「教育」，東京：遊學編譯社出版，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1903年8月7日），收於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遊學譯編》總第1冊，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865-870。
- (作者不詳)：〈擬東京大同高等學校講義錄敘例〉，《清議報》第34冊，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1900年1月30日）。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2183-2188。
- 〈上海競業旬報簡章〉，《洞庭波》第1期。收於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二十世紀之支那、洞庭波、漢幟（合訂本）》總第1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總頁229-230。
- 〈國學社已刊書目廣告〉，《江蘇》第4期，東京：江蘇同鄉會出版部，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閏五月一日，缺頁碼。

- 〈勞心與勞力〉，收於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湖北學生界》總第1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總頁404-405。
- 〈智羣百（作者按：白）話報廣告〉，《江蘇》第5期刊末廣告，東京：江蘇同鄉會出版部，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閏五月一日，無頁碼。
- 〈新刻譚壯飛先生仁學全書出售〉，《清議報》第85冊，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一日（1901年7月16日），無頁碼。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5383。
- 〈論日本近時政黨與政府之衝突〉，《浙江潮》第1期「學術·政法」，光緒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1903年2月17日），頁35-48。
- 〈論國語統一之關係及統一之法〉，《大公報天津版》第1版，1904年10月30日。
- 〈學生之競爭〉，收於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湖北學生界》總第1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總頁175-186。
- 大久保利謙：《日本近代史学の成立》，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年。
- 山下重一：《スペンサーと日本近代》，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83年。
- 山田邦彦，（譯者不詳）：〈學校行政法論〉，《遊學譯編》第2冊「教育」，東京：遊學編譯社出版，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902年12月14日）。收於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遊學譯編》總第1冊，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23-132。
- 川合隆男：〈付：解題 近代日本社會學史叢書 第1期・草創期（幕末—明治初年）、生成期（明治10年—30年）のこと〉，收於橫山原之助著，近代日本社會學史叢書編集委員會編：《近代日本社會學史叢書第38卷：海外活動之日本人》，東京：龍溪書舍，2008年復刻版，頁1-34。
- 川合隆男：《近代日本社会学の展開：学問運動としての社会学の制度化》，東京：恆星社厚生閣，2003年。
- 王天根：《群學探索與嚴復對近代社會理念的建構》，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

- 王汎森：《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
- 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臺北：允晨文化，2014年。
- 王汎森：〈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晚清以來的「複合性思維」〉，收於思想史編委會：《思想史6——專號：五四新文化運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頁239-249。
- 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收於徐興慶編：《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頁229-292。
- 木村直惠著，顧長江譯：〈「社會」概念翻譯始末——明治日本的社會概念與社會想像〉，收於孫江、陳力衛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二輯）》，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頁138-153。
- 中島半次郎著，（譯者不詳）：〈論學校對家庭與社會之關係（譯日本中島半次郎教育學講義）〉，《遊學譯編》第8冊「教育」，東京：遊學編譯社出版，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1903年5月31日），頁5。收於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遊學譯編》總第2冊，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777。
-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叢報》第4號，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1902年3月14日），頁59-68。
- 民友社編：〈武備教育（續第二冊）〉，《遊學譯編》第3冊「軍事」，東京：遊學編譯社出版，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頁13、15。收於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遊學譯編》總第1冊，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25、227。
- 民報報館編：《民報》總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影印科學出版社底本。
- 民意（胡漢民）：〈告非難民主主義者〉，《民報》總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影印科學出版社底本，總頁1862-1864。
- 古城貞吉譯：〈日本名士論經濟學〉，《時務報》第14期，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1896年12月15日），頁27a-27b。
- 古城貞吉譯：〈譯社會〉，《時務報》第17期，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頁23b-24b。

- 古城貞吉譯：〈譯社會〉，《時務報》第18期，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1897年2月22日），頁28a-28b。
- 加藤弘之：〈十九世紀思想變遷論〉，《清議報》第52冊，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1900年8月5日）。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3785。
- 有賀長雄著，（譯者不詳）：《近世政治史》，坂崎斌編：《譯書彙編》第1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年，頁59-66。
-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 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沈國威編著：《新爾雅：附解題·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 坂崎斌編：《譯書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年。
- 壯遊：〈國民新靈魂〉，《江蘇》第5期，東京：江蘇同鄉會出版部，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八月一日，頁1-9。
- 宋學勤：〈梁啟超與社會學〉，《史學月刊》2007年第12期，2007年12月，頁95-101。
-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收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
- 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譯：《社會學》，上海：廣智書局，1902年。
- 沼胡：〈教育私議〉，《江蘇》第5期「教育」，東京：江蘇同鄉會出版部，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七月一日，頁35-43。
- 承紅磊：〈康有為與「社會」一詞的再使用〉，《東亞觀念史集刊》第7期，2014年12月，頁299-326。
-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編輯委員會編：《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
- 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中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收於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

- 研究中心，2008年，頁175-220。
- 柳父章：《翻譯語成立事情》，東京：岩波書店，1982年。
- 侯生：〈哲學概論〉，《江蘇》第4期，東京：江蘇同鄉會出版部，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閏五月一日，頁39-50。
- 韋政通：《荀子與古代哲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
- 姚純安：《社會學在近代中國的進程（1895-1919）》，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
- 哀時客（梁啟超）：〈愛國論一〉，《清議報》第6冊，光緒二十五年一月十一日（1899年2月20日）。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319-324。
- 哀時客（梁啟超）：〈論學日本文之益〉，《清議報》第10冊，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1899年4月1日）。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579-581。
- 重堪：〈自治篇〉，《浙江潮》第6期，浙江：浙江同鄉會編輯部，光緒二十九年六月二十日（1903年8月12日），頁1-10。
- 孫林：〈斯拉夫人種與條頓人種之競爭〉，《浙江潮》第2期「大勢·國際政局」，東京：浙江同鄉會編輯部，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1903年3月18日），頁87-98。
- 宮永孝：〈社会学伝来考——幕末・明治の社会学（1）〉，《社会志林》第52卷第3號，2005年12月，頁190-104。
-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1冊、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影印民國25年前北平圖書館重印本。
- 海留司烈著，（譯者不詳）：〈社會行政法論〉，收於坂崎斌編：《譯書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年，頁29-36。
- 章太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 廬書初刻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章太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念馳編訂，潘文奎點校：《章太炎全集（八）· 醫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 章太炎著，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章清：《清季民國時期的「思想界」：新型傳播媒介的浮現與讀書人新的生活形態》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 望月鶯溪稿：〈對東政策〉，《清議報》第14冊，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初一日（1899年5月10日）。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859-863。
- 康有為：《日本書目志》，收於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3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 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3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 康有為著，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斟癸：〈新名詞釋義〉，《浙江潮》第2期，東京：浙江同鄉會編輯部，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1903年3月18日），頁181-190。
- 陳禹仲：〈近代早期歐洲思想史中的曼德維爾〉，收於思想史編委會：《思想史4》，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頁275-312。
- 陳寶良：《中國的社與會（增訂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 梁啟超：〈論中國人種之將來〉，《清議報》第19冊，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1899年6月25日）。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1183-1192。
- 梁啟超：〈論支那獨立之實力與日本東方政策〉，《清議報》第26冊，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初一日（1899年9月5日）。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編》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1670-1676。
- 梁啟超：〈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清議報》第26冊，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初一日（1899年9月5日）。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編》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1661-1670。
- 梁啟超：〈飲冰室自由書〉，《清議報》第37冊，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1900年3月1日）。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

- 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2383-2390。
- 梁啟超：〈機埃的格言〉，《清議報》第100冊「飲冰室自由書」，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1901年12月21日），頁3b。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6210。
- 梁啟超：〈問答〉，《新民叢報》第11號，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五日（1902年8月8日），頁87-90。
- 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收於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第15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
-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2、3、4、5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
- 張灝：《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
- 黃克武、韓承樺：〈晚清社會學的翻譯及其影響：以嚴復與章炳麟的譯作為例〉，收於沙培德、張哲嘉主編：《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頁111-177。
- 黃克武：〈何謂天演？嚴復「天演之學」的內涵與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5期，2014年9月，頁129-187。
-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6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光緒五年孟冬同文館集珍版。
- 黃遵憲著，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無涯生：〈勸各地立祀孔子會啟〉，《清議報》第11冊，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1899年4月10日）。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643-652。
- 馮凱（Kai Vogelsang）著、朱聯璧譯：〈中國「社會」：一個擾人概念的歷史〉，收於孫江、陳力衛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二輯）》，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頁99-137。
- 普澄：〈衛生學概論〉，《江蘇》第3期，東京：江蘇同鄉會出版部，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四月一日，頁75-86。

- 遠東過渡客：〈新名詞之雜貨店〉，《杭州白話報》1902年第2卷，1902年，頁17-20。
- 劉禾 (Lydia H. Liu) 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
- 潘光哲：〈「殖民地」的概念史：從「新名詞」到「關鍵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2期，2013年12月，頁55-92。
- 儂更有情：〈愛之花〉，《浙江潮》第6期，浙江：浙江同鄉會編輯部，光緒二十九年六月二十日（1903年8月12日），頁1-9。
- 劉師培：《劉師培全集》第3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
- 劉師培著，萬仕國輯校：《劉申叔遺書補遺》下冊，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
- 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
- 蔡鏗：〈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功課〉，《清議報》第29冊，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一日（1899年10月5日）。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近代期刊彙編》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頁1871-1876。
- 錢新祖著，宋家復譯：《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
- 韓承樺：《審重咨學：嚴復翻譯《群學肄言》之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
- 韓承樺：〈從翻譯到編寫教科書：近代中國心理傾向社會學知識的引介與生產（1902-1935）〉，收於張仲民、章可編：《近代中國的知識生產與文化政治：以教科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26-152。
- 韓承樺：〈當「社會」變為一門「知識」：近代中國社會學的形成及發展（1890-1949）〉，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7年7月。
- 齋藤毅：《明治のことば：文明開化と日本語》，東京：講談社，2005年。
- 羅存德 (Wilhelm Lobscheid) 著，井上哲次郎訂增：《訂增英華字典》，東京：藤本次右衛門出版兼發行，1884年。
-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

- 嚴復著，王栻主編：《嚴復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鐵郎（陳家鼎）：〈二十世紀之湖南〉，《洞庭波》第1期，東京：中國留學生會館，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四年九月一日。收於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二十世紀之支那、洞庭波、漢幟（合訂本）》總第1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頁139-140。
- Baker, Keith Michael.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stitution of Society: Notes for a Conceptual History." In *Main Trends in Cultural History: Ten Essays*, edited by Willem Melching and Wyger Velema. Amsterdam-Atlanta: Rodopi, 1994.
- Bruce, Steve and Steven Yearley. "Society," In *The SAGE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edited by Steve Bruce and Steven Yearley. London: SAGE, 2006.
- Figes, Orlando Guy and Boris I. Kolonitski.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Hemeling, Karl Ernst Georg.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6.
- Holmwood, John. "Society." In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Edited by Bryan Stanley Turn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Howland, Douglas R. *Translating the West: Language and Political Reason in Nineteenth-Century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 Hundert, Edward G. *The Enlightenment's Fable: Bernard Mandeville and the Discovery of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Koselleck, Reinhart, ed. "Begriffsgeschichte and Social History." In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eith Tribe, 8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 (online version), s.v. "Society,"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5, <http://www.oed.com/view/Entry/183776?redirectedFr>

om=society#eid.

Ray, Larry. "Society," In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IX, edited by George Ritzer and Ryan J. Michael. Malden: Blackwell, 2007.

Seligman, Adam B.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Toronto: Maxwell Macmillan Canada;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92.

「《大公報：1902-1949》」資料庫，網址：<http://tk.dhcdb.com.tw/tknewsc/tknewskm>，檢索日期：2017年4月12日。

「民國時期期刊文獻資料庫」，網址：<http://www.cnbkysy.com>，檢索日期：2017年4月13日。

「近現代漢語學術用語研究資料庫」，網址：http://mcst.uni-hd.de/search/searchMCST_short.lasso，檢索日期：2013年9月12日。

「英華字典資料庫」，網址：<http://140.109.152.25:8080/mhdata/index.php>，檢索日期：2015年12月14日。

井上哲次郎編，有賀長雄增補：《哲學字彙》，東京：東洋館，1881年，「近現代漢語學術用語研究資料庫」，網址：http://mcst.uni-hd.de/search/searchMCST_short.lasso，檢索日期：2013年9月12日。

井上哲次郎編，有賀長雄增補：《哲學字彙》，東京：東洋館，1884年，日本國會圖書館「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資料庫，網址：<http://kindai.ndl.go.jp/info:ndljp/pid/994560>，檢索日期：2013年9月12日。

日本國會圖書館「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資料庫，網址：<http://kindai.ndl.go.jp/info:ndljp/pid/994560>，檢索日期：2013年9月12日。